

南京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戴笠与忠义救国军

姓名：邢烨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马振犊

20080515

中文摘要

忠义救国军因为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而一直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也由于此，忠义救国军在大陆人们的印象中，是以胡传魁、刁德一为代表的一支反共与投日的汉奸军队的典型形象，是土匪加汉奸的武装。而事实却不完全如此。

审视《沙家浜》以外真实的“忠义救国军”，以这支曾在全民族抗战中扮演过特殊角色的队伍为研究对象，给予系统的剖析和客观的评价，可以填补全民族抗战史及国民党敌后抗战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对于还原抗战历史的真实，消弭海峡两岸之间认识的差距、增进两岸的学术和情感交流各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本文主要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介绍选题理由及意义，并总结国内外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所拟解决的问题；第二章着重介绍戴笠对忠义救国军建军及改编的重要影响；第三章主要从时间顺序上具体考察了忠义救国军的发展情况；第四章着重介绍了忠义救国军进入中美合作所后的培训和抗战事迹；第五章则介绍了忠义救国军的最后去向；第六章总结全文。

关键词：戴笠；忠义救国军；关系

Abstract

Zhongyi-jiuguo Army was active on the historic stage because of the Beijing opera “Shajia Bang”. And because of this, people always think of Zhongyi-jiuguo Army as an army which is against communists and have complicated relation with Japanese army. But the fact was not absolutely what we knew.

It is our duty to look closely at this army, research into the part which the army playe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alyze and remark on it objectively. And we can fill the blank of the history of the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importance of battlefield of National government did in the battlefield. It also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the national memory.

My thesis divides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reviews the reasons and the importance of my choosing this subject, summing up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studying this subject, and the questions for us to resolve. In the next four parts, it recommend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Zhongyi-jiuguo Arm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Li and the Army. Last part finish the thesis.

Key words: TaiLi; Zhongyi-jiuguo Army; Relationship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 1、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 2、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
- 4、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 5、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邢烨
日 期： 2008.5.15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南京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作者签名： 邢烨
日 期： 2008.5.15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选题理由及意义

几年前,在大陆现代京戏《红灯记》在台湾得以公演的同时,《沙家浜》却被台湾当局禁演;而《沙家浜》在“文革”期间风靡大陆,直至现在仍不减当年“魅力”。在这中间,主要的问题是忠义救国军¹的历史定位问题尚未解决。

在大陆人们的印象中,忠义救国军是一支以胡传魁、刁德一为代表的反共与投日的军队,是土匪加汉奸的武装,而在台湾社会大众心目中,对于忠义救国军却有着与大陆完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曾参加过“忠救军”抗日斗争的老兵及其亲属在情感上也无法接受京剧《沙家浜》的夸张和脸谱化演绎。

在这种情况下,审视《沙家浜》以外真实的忠义救国军,以这支曾在全民族抗战中扮演过特殊角色的队伍为研究对象,给予系统的剖析和客观的评价,可以填补全民族抗战史及国民党敌后抗战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对于还原抗战历史的真实,消弭海峡两岸之间认识的差距、增进两岸的学术和情感交流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它在沪战之初就开始筹备,一经建成就成为当地成立时间最早、体系完备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并在淞沪会战中配合正规军作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经过了整编发展之后,这支在国民党军统组织控制下的特殊武装部队被部署在苏浙皖敌后,承担了与正规军不同性质的作战任务。他们既对日伪设施及部队多加破坏打击,也与共产党新四军发生过摩擦,因此这支武装的性质一直颇受争议。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了解“忠义救国军”及其他国民党敌后武装,对于研究抗日战史,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忠义救国军的成立、发展、壮大和最后去向,无不与国民党军统组织负责人戴笠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在台湾相关的资料与论著中也有明确记载。本文拟结合各方面材料,厘清戴笠、忠义救国军相关史实及相互关系,期能对戴笠研究中的某些空白起到补充深化的作用,同时也使海峡两岸对戴笠、对忠义救国军的认识和评价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该课题涉及到戴笠其人与忠义救国军两个研究主题,因此对戴笠、忠义救国军和两者关系的研究各方面都要兼顾涉猎。目前,除个别情况外,国外对该课题的系统研究基本还处于真空状态,而相关的材料和研究主要还是在大陆和台湾地区。

大陆对于该课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的回忆录比较零散,分散在各地的文史资料中,以及对军统组织的相关回忆录或带有文学演义色彩的读物中,涉及面广,而且零散,需要仔细搜集和鉴别。笔者在查阅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大量文史资料后,发现了几十年来积累下的不少与忠义救国军相关的内容。另外,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对国民党敌后抗战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忠义救国军作为军统敌后活动的重要武装部队也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在大陆学界研究国民党敌后抗战的论著中,也涉及到了忠义救国军的内容,如:黄寿东、苏智良著《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初探》(载《档案与史学》1997年3月刊)、孟国祥的《不忠不义的忠义救国军》(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何蜀的《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载《文史精华》2000年第6期),毛德传的《忠义救国军始末》(载《军事历史》2002年第2期)、《忠义救国军及其最后的覆灭》(《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7期),洪小夏《关于上海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以及网上传

¹ 忠义救国军习惯上也简称为忠救军。

甚广的方晓伟的《八年血路—抗战八年中的忠义救国军》等文。这些文章涉及到了一些对忠义救国军的正面评价，但因为相关材料的匮乏，没有完全掌握忠义救国军的发展脉络及其相关史实，因此也不可能对其有深入的评价。

台湾地区是研究民国史的重地，研究本课题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忠义救国军志》是汇编成册专门讲述忠义救国军历史沿革的专著，所记述的事实都比较具体，但是它完全以歌功颂德的态度为其纪传，也回避了不少负面的事实，在某些细节上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样是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中美合作所志》中，也有相应的史料可查。另外，台湾一些回忆录性质的史料相对集中。如费云文的《戴雨农与忠义救国军》（《中外杂志》第13卷第6期）、徐志道的《戴笠将军与我》（《中外杂志》第14卷第1期）、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中外杂志》第25卷第1期）等一些文章，这些都是戴笠身边的人对相关事件的回忆，其中包含了不少忠义救国军的情况。此外，还有章君谷的《杜月笙传》中也涉及到一些忠义救国军的前身—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情况，这些都是研究戴笠和忠义救国军的一手材料。

此外，笔者在搜集材料时，曾在网上与一些对忠义救国军关心、关注的人士有过交流，其中几位的祖父辈曾经参加过忠救军，但长久以来，他们的祖父辈鲜少提及往事，因而他们对忠义救国军的性质、性能一知半解。随着网络的发达发展，忠义救国军作为一支活跃在敌后的武装部队被更多的人认识和讨论，因此，对忠义救国军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作者将戴笠和忠义救国军作为毕业论文课题，以厘清戴笠与忠义救国军之间相关史实及其关系为目的，希望以此能对戴笠及其忠义救国军的关系的研究做出新的探索，并进一步推进有关课题的研究工作。

第二章 戴笠与忠义救国军起源

戴笠早年浪迹于上海、杭州等地,投身黄埔军校后得以接近蒋介石,因其在搜集情报方面的突出成绩,逐步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他从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再到后来跃升为军统局的一把手、蒋介石情报特务工作的左右手,这些与他做特工的天赋与灵敏的政治嗅觉都是分不开的。

作为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创始人,戴笠更深谙掌握武力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是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它的成立,就是出自戴笠的设计。

第一节 戴笠建军的设想及实践

戴笠向来重视武力在政治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¹当他看到胡宗南、陈诚等武将都手握重兵,甚至另一特务系统的康泽也控制了别动总队和禁烟督察处缉私室巡缉团之后,这种愿望会更加强烈。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成立,就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戴笠建军的实践起于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组成的便衣队。早在8月初日军进犯北平前,陈恭澍联系到陈维藩和史岳山等部2000多人、枪700多支,组成便衣队在天津附近活动。此事上报给戴笠后,戴笠即复电说:“兄在数日内,能号召便衣队及枪枝数百,且有战区义勇军可以无条件为国效力,足证工作努力,无任佩慰!弟意当此我军退出平津,大战即将开始之时,此时最要者,是扰乱敌方之工作。如敌兵车之袭击,运兵铁道之破坏,敌兵步哨之袭击,敌军弹药粮秣之烧毁,汉奸之制裁,与夫在敌方民意之表现,如散发抗日救国传单,对敌士兵之宣传等等。目前急应在平津及附近一带,到处发动,使敌不安。同时在国际间表现我中华民族断非弱者,决不屈服也。最要者,是希望有真实动作之表现,与所报之人枪,确有把握也。此事系吾人对领袖信用攸关,务请吾兄切实考察,详确电示。如真有把握尚有实力,则每人每月十五元之生活维持费,弟所担保也。”²从电报中可以看到,戴笠对陈组织部队一事高兴异常,而且为其将来的敌后游击工作指示详尽。但高兴之余,他对组建部队仍是相当谨慎,对陈恩威并施,重申此事意义重大,希望看到“真实动作之表现”。随后戴笠委任王天木和陈恭澍为滦榆游击司令和副司令,王抚洲为政治部主任,收编当地警察千余人、平原、恩县张栋臣、李娃娃等部数千人为主力,带领所部在天津附近进行敌后活动,“颇有成效”。这一成就实实在在地激励了戴笠。

正在此时,在上海有洪帮智松堂堂主向海潜(号松坡)通电请缨,号称手下有群众数十万等候点编,戴笠认为可以大加利用,便以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言设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别动队”³,预备以此部队配合国军作战,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另一方面,万一上海失陷,也可据此队伍潜伏在京沪杭⁴地区作敌后行动,进行情报搜集、突袭破坏、民众动员等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拥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

当他指定时间地点开始编制队伍时,才发现向海潜所说的“请缨之士”人数其实不过数百,而且其中多半是一批长期吸食鸦片和海洛因等毒品而骨瘦如柴的“老枪”⁵。戴笠在感

¹ 郭旭:《戴笠及军统和杜月笙的关系》,见陈楚君、俞兴贤编《特工秘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² (台)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六)》,台北《中外杂志》第24卷第6期,摘自《戴笠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259页。

³ 恽逸群:《杜月笙论——从一个人看上海社会和中国政治》,《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2页,原载1943年9-10月出版的上海《杂志》11卷6期、12卷1期。

⁴ 京指南京,下同。

⁵ 恽逸群:《杜月笙论——从一个人看上海社会和中国政治》,《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2页,原载1943年9-10月出版的上海《杂志》11卷6期、12卷1期。

到“上当”之余却也茅塞顿开。为了招兵买马，戴笠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开始密切接触，在短期内落实到了人枪。随后，戴笠就向蒋介石报告了建军情况。

戴笠建军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努力尝试，却一直未得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对戴笠虽然重用，但也窃惧戴笠的实力膨胀而尾人不掉，因此对其建军的想法始终不予考虑。基于抗战大义，和国民党发动游击战争具有的一定的思想基础，以及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蒋介石最终改变以往态度允许戴笠组建队伍，于9月4日由南京发出支电，7日又发出阳电，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戴笠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组建自己部队的权力。

戴笠拥有强烈的建军欲望，他用敏锐和前瞻的眼光，看准了抗战军兴的历史机会，缜密行事，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从此他对所掌握的军队武装不愿再放手。

第二节 与帮会合作建军

当时上海地区产业经济发达，工人阶层力量壮大，且学校集中，学生众多，相对来说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民众爱国热情高涨，对抗日救国态度坚决，投身抗战义无反顾。自九一八以来，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洗礼，上海广大的工人、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战热情，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八一三”淞沪开战后，他们又以高昂的激情投身战场，组建上海别动队¹，进行维护治安和锄奸的活动。这为以抗日名义组建部队奠定了良好的兵源基础。

上海地区参加帮会的工人众多。战前，上海地区的产业工人、失业的工人数量在全国来说都属于领先，参加帮会的工人也多，仅邮局方面入会的职工就占到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以及各地方帮口等等，全市职工总数中加入帮会的比例就更大²。帮会组织丛生，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当局在上海地区的控制力，因此利用帮会也不失为一条组织动员群众省时省力的便捷途径。这也是杜月笙作为海上闻人、帮会势力的头目，成为国民党极力拉拢对象的最主要原因。

杜月笙早年崛起于上海帮会，到抗战爆发前已经是上海滩闻名人，在社会基层黑帮中拥有相当势力，并插手政界，与国民党各派系保持多方联系。从1927年“清党”到抗战爆发，上海帮会经过了“黄金十年”的发展阶段，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多方合作、互相利用、各得所需。环顾当时的上海，事实上杜月笙确实拥有这种号召力，能够在一个月的短暂时间内帮助戴笠拉起一支象模象样的队伍；此外，以杜月笙历来与国民党合作的表现，以及杜对戴笠表态不会“落水”做汉奸的交，戴笠自可以放心在沪战之后，继续利用杜的声望和影响来巩固和扩大队伍，在入伍的帮会分子中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杜也一直有心结交掌握着国民党特务大权的戴笠，虽然之前戴杜两人的直接联系还不多，但双方手下却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加强联系。杜氏恒社³中的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都在这期间与军统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还当上了上海行动股股长。戴笠手下的不少人员也都与当地帮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直接加入帮会，在帮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如何行健虽然是黄埔出身，却也在帮，王兆槐不但在帮，还是恒社的社员。

¹ 上海别动队，成立于1937年8月18日，由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为司令，下辖两个纵队，其成员多为工人、学生和店员。

² 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和帮会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54辑 旧上海的帮会》，第4页。

³ 恒社，取“如月之恒”的典故由杜月笙组织，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仍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

而戴杜的终于合作，与其二人的立场和明确的抗日思想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国共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之际，戴笠就意识到今后的主要目标要转向抗战，而不是如过去集中力量反共了，他开始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在他平时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戴笠对中日之战的看法和态度。沪战之前，戴笠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哀兵必胜”之类的话语，而“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¹这句话更为直率。在当时其他国民党军政要人尚有动摇彷徨之际，他的抗战言论颇具特色，以至后来成为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语言。而戴笠一早开始的情报搜集行动也在后来被证明是积极有效的行为，他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英美等国情报机构的青睐。

杜月笙对抗战也持有比较积极的态度。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大势形成之后，杜月笙在反抗日本侵略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坚决性，他组织抵制日货、援助抗日将士、救济难民和办理善后等一系列活动，博得了许多包括左倾进步力量和国民党上海当局在内的社会各方的赞扬。他在抗战的问题上的态度也比较明确。在号召募捐和宣传抗战的时候，杜曾经就提出，抗战只能靠自己，而不能对国联“存着依赖心”。他认为，战争不在一时的胜败，而在持久的奋斗，在最后的胜利，“我们不但是求得一次的压服敌人就算胜利，最要紧的是能够持久地奋斗下去”，“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²在淞沪会战中，杜月笙也确实做到了不顾炮火而出入前线，每逢有大部队开到上海，他就带着大批慰劳品亲自慰问军队，为前线解决了不少问题³。

8月7日，朱学范向杜月笙提出武装工人抗日的建议，当时杜考虑由筹募委员会出钱，他出枪枝⁴。巧合的是，几天后戴笠就为了组建部队的事情登门造访，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帮会组织覆盖范围的广泛以及国民党特务人员和帮会的特殊关系，戴笠在组建部队的时候优先考虑了与帮会的结合，使其顺利地短期内实现了组建部队的愿望。戴、杜两人类似的抗日思想和相互依赖利用的打算，不仅为他们在沪战期间的武装合作确立了基础，也为他们在整个抗战时期里的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创造了前提。

第三节 插入和培植自己的势力

8月底，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戴笠的指导下在上海成立，委员有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张啸林、贝祖贻、张治中、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十余人⁵。戴、杜、刘为常务委员，戴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探、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组，由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等分任各组组长。

9月4日与9月7日南京给戴笠所发的支未、阳已两待参电⁶令，明确要求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在1个月之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戴笠以后便以收到“支电”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和隶属于该会的别动队的成立纪念日⁷。委员会下属别动队随后成立，刘志陆被任命为总指挥，

¹ 《戴笠自述》，摘自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² 《演说及抗战后援会告全国同胞书》，转引自刘才斌：《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³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三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8月30日再版，第161页。

⁴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页。

⁵ 参见（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8页。另有资料认为向松坡也参与其中，参见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6页。

⁶ 参见（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7页。

⁷ 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2页。

共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长何行健，保定军校四期出身，脚跨青洪两帮，也是军统的老特务，其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大多都是帮会分子及上海劳工人士。第二支队长陆京士和第三支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门徒，其所部编组和第一支队相同，成员包括朱学范组织的勇进队队员 400 多人¹，以及上海别动队的大部成员，他们大多都是上海工会分子。第四支队长张业，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多为京沪一带原有的情报和行动工作人员。第五支队长陶一珊，也是戴笠的老部下，该支队下辖五个大队及一个特务中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较前四支队所属大队多辖一个中队），成员包括部分上海别动队成员，其余多为受过国民军事训练的青年，也有不少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干部多数具有良好的军事学经历，武器也很充足，是国军三十六师、八十七师换下来的枪枝²。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五支队从兵力、素质、还是装备各方面来说都较其他各支队为优。特务大队队长赵理君，也是戴笠的亲信，下辖三个中队，官兵基本也都是特务处在京沪地区原有的情报和工作人员。

别动队在匆忙中建成，又急于投入战场与强敌抗争，考虑到部队的成员庞杂，许多人既无战斗经验，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有的甚至是出钱雇佣而来³，入伍动机明显不纯，诸多因素叠加，必然影响到队伍的战斗力，戴笠遂又命文强在别动队中增派中下层干部。在一周之内，别动队即加入经过筛选的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军官 600 多名，又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 100 多名来沪报到，分批安置在各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为了补充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又从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抽调 200 多名中高级干部来沪候听分配；至于班长一级的人才，则是向负责浦东防守之责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由其部队商调而来⁴。如此，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部队建制基本完成。

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戴笠发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是经过章乃器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中的不少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他觉得让这些有一定受教育程度的知识青年当一名普通战斗队员是浪费人才的举动，考虑到战争的需要和特务处组织机构的长远发展，苏浙行动委员会即设立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三个培训机构，培养训练别动队各支队中下级干部。戴笠对训练班非常重视，每班主任都由其自兼，另派副主任主持各班具体事务。无论他如何忙，都会尽量主持开学或毕业典礼，对学员进行精神训话。这一套以后也运用到军统的其他部门。

青浦技术训练班，由余乐醒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班址设在青浦城内西溪小学，学员主要是别动队各支队的中下级干部，共 408 人，训练时间为期一个月，主要培养学员从事战斗、爆破侦察等基本能力。在 11 月 4 日开学典礼的时候，戴笠特地从南京赶来主持了仪式，并作了长篇精神训话⁵。1937 年 11 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青浦班学员向安徽撤退，途中戴笠下令把青训班直接挂在军事委员会下，取消了苏浙行动委员会这个中间环节。沿途很多学员都失散了，到祈门历口的时候人数还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⁶。这剩下的人中，一部分由别动军的剩余部队任命使用，另一部分由特务处派入上海做秘密工作。在忠救军的不断壮大过程

¹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84 页。

² （台）乔家才《抗日情报战（十一）》，《中外杂志》第 22 卷第 5 期，摘自《戴笠传记资料》天一出版社 1985 年，第 116 页。

³ 向海潜向人诉苦时透露，说杜月笙以百元或 50 元作为“安家费”到各难民所去招兵，参见《湖北文史资料》总第 23 辑 张执一白述，第 97 页。

⁴ 参见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第 77 页。

⁵ 参见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58 辑，第 181 页；也有说培训时间为两周，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 年 6 月出版，第 29 页。

⁶ 另一说剩 300 名左右，见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58 辑，第 183 页。

中,大多青训班的成员都担任了连营级以上干部,成为了后来忠义救国军的骨干¹。

松江特训班继青浦训练班后成立,由汪祖华副主任,谢力公为总教员,班址设在松江城内中山路西渡小学。学员成分和训练时间基本和青浦训练班相同²。这个班主要训练侦探专门技术,由于日军的一次突然轰炸,松江班遭受严重的打击,全班五百余人,幸存者不满五十人,惨状难言³。当时该班设在金山卫的学员大队的大队长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廖曙东,他在撤退时跃入一水潭,被日军包围,随即他用自己的配枪击毙逼近的十数名敌兵,口中高呼着“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下牺牲⁴。后因其英勇事迹被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上校。

青浦和松江班在与敌对抗中,除了伤亡,也有一部分溃散人员,当时戴笠命人一面收容一面潜伏,同时在佘山成立别动队教导团,自任团长,俞作柏为副团长,将青浦松江两班并入教导团,并由各支队抽调部队入团训练为长期抗战做准备,主要负责提高别动队中下级干部的指挥、侦察、行动和破坏等能力。

戴笠在军统内部还开办了其他性质的训练班,对军统内部人员不断的进行政治和技能的训练,而在忠义救国军的不同发展阶段,他对忠救军中下层人员的训练也没有停止过,以此来培养忠于戴笠个人的行动和工作人员。

第四节 别动队历口改编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组建之后,未及整训完毕,即在战火的逼迫下作为正规军的补充而投入战斗。他们承担了不同的任务,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配合正规军作游击战。总体来讲,这支军队虽然刚刚建成,尚未形成较强的战斗力,也缺乏实战经验,但面临强悍的敌人,他们丝毫不逊色于正规军。据文强回忆,他到前线视察慰问的时候,看到各大队坚持奋战,“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甚至自动去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许多基层队员的英勇抗战事迹不胜枚举。

到11月初全线撤退前夕,文强奉命率一批女工作人员代表苏浙行动委员会前往租界各医院慰问时,别动队的伤员就有500多名,而据人事科的调查统计,别动队阵亡官兵达到1500人以上。从淞沪战场上撤退后,文强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他派出的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收容得万人中的五分之一,其余大多数都在战斗中流散或牺牲了。

最后,包括特务大队官兵,及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等全部官兵学员生在内的1700多名官兵,由军事组组长俞作柏率领,经苏州、溧水、繁昌、九江,于12月转达安徽省祁门县属历口。为了整顿部队,戴笠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改编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一团”⁵。而第一支队下属雷忠大队则由何行键率领,于1938年初经奉化撤至遂安,与戴笠部署毛森在江山办的一所游击干部训练班及东阳、巍山的浙东支队合编为教导第二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指挥部也同时改为别动队教导团总团部,负责督导第一、第二教导团,就地实施训练。由戴笠亲自兼任总团长,俞作

¹ 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82页。

² 也有一说松江班约200人,参见黄康永口述 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100—101页。

³ 王家树:《上海工人参战追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1985年6月,第465页。另有一说幸存者有100余人,参见郭旭:《戴笠及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摘自《特工密闻: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

⁴ 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8页;《浴血山河——也看国民革命军将士“亮剑”之血性和气魄 比比皆是!》,摘自中国黄埔军校网。

⁵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4月出版,第11页。

柏任副总团长，负实际责任。

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到蒋介石元侍鄂代电，“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¹。戴笠当即派遣阮清源、鲍步超²等人潜进敌区，配合留置敌区之干部及武装部队，开展收容扩编工作。对经点验人枪、能接受改编的部队，给予支队、总队或直属大队的名义，发给给养费用等。到1938年4月底5月初，在浦东、京沪及沪杭线上已经成立陈之裁的直属第一大队250余人，李志明、于陶生的第三、第四支队2500余人，朱寿华³第五支队2500余人，第六支队杨行方⁴1350人左右，第七支队程万军⁵3600人左右，管容德的南京行动总队1300余人，包括在历口整训的俞作柏率领的第一、第二支队，共有16000余人⁶。

由于别动队名称与康泽属下别动队重名，为避免混淆，蒋介石在1937年10月曾提议戴笠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名，因为沪战紧急，戴笠一直未及办理，到1938年5月，戴笠奉到一侍参鄂代电核准，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在汉口成立了总指挥部。从此，这支特殊的国民党敌后武装正式挂牌成立了。当时戴笠兼任总指挥，由徐光英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随即由汉口出发，经江西南昌、安徽屯溪，进驻浙江孝丰，接替前“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的指挥权：一方面指挥所部，对敌进行战斗，另一方面，继续收编流散国军，号召地方武力，以此壮大抗敌实力。

第五节 小结

到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的特务系统才算正式形成，但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戴笠始终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源自他“抗日”与“建军”的双重考虑，我们从以上各种事实的发展来看，戴笠对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发起到改编，是有着精心的准备和长远的计划的。

首先，这体现在戴笠向蒋介石申请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名称上。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在淞沪战争中诞生，主要阵地是在淞沪地区，但却被冠以“苏浙”这个头衔，这无疑扩展了别动队的使命，使得别动队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而能够名正言顺。此后，别动队一度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最后更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辖于军事委员会，将其组织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

其次，当时国民党对于帮会的政策，是掌握其组织，运用其力量，限制其发展。戴笠秉承了蒋介石的衣钵，更得到蒋介石“既要利用杜，又要控制杜”⁷的密令，运用各地帮会组织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戴笠和杜月笙在上海近郊组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就是军统与各地帮会正式合作的开始，为以后国民党的帮会政策的执行树立了榜样。

再次，从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组成成员的背景和成分也可以看出端倪。苏浙行动

¹（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11页。

²阮清源，字亚承，又名袁亚承，浙江嵊县人，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特警班，曾参加过康泽所办的星子训练的别动队，是戴笠的得意门生。鲍步超，别名宗汉，浙江淳安人，黄埔六期。

³又名朱松寿，1928年担任过中共江阴县委委员，参加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后滕、杨舍等地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在江阴、无锡一带很有号召力，其部是江阴东乡实力较强的一支部队。8月下旬，朱松寿率一部脱离忠救军，接受共产党领导，成立江浙人民抗日自卫军，简称“民抗”。五支队即由阮清源领导。

⁴杨行方后来软禁忠义救国军总部所派的专员林云江，受到阮清源部攻击，溃败后逃亡上海，其参谋主任郭墨涛后为第六支队长。

⁵程万军原在九十八师当连长，后脱离部队，在太湖一带自组游击队，被忠义救国军收编，因未按规定整编，于1938年冬叛变投敌。

⁶参见《戴笠致蒋介石报告》（5月20日），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七三一—733。

⁷徐远举等著：《军统局、保密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文史资料存稿精选3 蒋记特工揭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的高级人事安排，表面上由戴、杜合作设定，实际重心却在黄埔系统。戴笠越过上海市长俞鸿钧而选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另设书记长办公室，自己兼任书记长，总揽一切。支队长人选除了陆京士、朱学范当时是上海工会负责人之外，何行健、张业、陶一珊是黄埔二、三、六期学生；至于陆、朱两个支队下的大队长、中队长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同学¹。

戴笠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运用传统“忠义观”，将军统纪律与对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忠诚和崇拜结合起来，用充满封建色彩的“忠义”作为精神纽带，突出了对国家领袖及他本人的“忠诚”、“义勇”的要求，也迎合了别动队内部大量帮会分子的“帮会情结”；在别动队解脱了淞沪战场作战任务之后，戴笠也得以继续维系这支队伍的存在，用“忠义”来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此外，“救国”也符合了时人对抗战卫国的责任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零散武装投入到他们的行列，更可以此取得陷区广大民众的支持。另外，也是以此名义与共产党所组织的游击队区分开来²。

同时，戴笠注重对相关人员的培训，不但亲任各训练班主任，还经常对学员“关怀备至”，通过这种手段他为自己打下坚实的组织、干部基础。

由上可见，别动队从成立、到经历了淞沪战场的血拼，以及后来的扩充整编，终于“变身”为忠义救国军，这期间戴笠“功不可没”，是其成立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而“忠义救国军”也因此注定脱不开军统的色彩，它在敌后的一切以军统的行为准则为标准，成为“戴老板”拥有的另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

¹ 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第 76 页。

² （台）良雄：《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4 月再版，第 199 页。

第三章 戴笠与忠义救国军发展

经过阮清源、鲍步超等人的收容整编后，部队初具规模，并在汉口正式挂牌成立。这些支队成为在京沪杭敌后的主力部队，一度填补了当地有建制的武装部队的空白，造成了一定的抗日局面。但随着形势的转变，作为军统武装的忠义救国军也必须忠实地执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内外方针，一方面从事敌后抗日行动，另一方面则与新四军等中共武装部队不断摩擦与争斗。因此，忠义救国军最初单一的抗日性质，有了质的改变。

戴笠在如愿组建了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部队之后，保持其低调的作风，于1938年9月辞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之职¹，由副总指挥俞作柏继任。虽然此后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三易其人，但无不与戴笠有着联系，在戴笠的指挥部署下，忠义救国军也经历了不平常的“抗战”八年。

第一节 借俞声望 扩编部队

俞作柏(1889~1959)，字健侯，号一则，广西北流县人。加入过同盟会，也参加过北伐，当过广西省政府主席。1929年10月因为发通电反蒋，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1936年12月25日任少将。戴笠最初对搞武装特务部队没有经验，经常向胡宗南请教，听胡说俞在广西代理主席时很有一套，在上海与杜月笙交好，又愿意为戴笠卖点力气，因此戴笠在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时，对俞作柏青睐有加。1938年初，俞作柏在历口任别动队教导团副总团长；戴笠辞去总指挥一职后，俞作柏即升任总指挥。然由于俞在军统中财力不够，一些特务不大听他的话，所以忠义救国军内部实际事务大多由尚望、周伟龙等人负责。

忠义救国军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苏浙皖边，当时在北平天津一带也曾有一支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也是戴笠刻意组织的，但因活动激烈且无后援，终被日伪围困在河北宝坻附近的潮沼地区，1938年冬就全军覆没了。

而忠义救国军主力从淞沪战场撤退后，一直在浙江孝丰地区整编训练，为进入京沪杭地区做准备。戴笠凭借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上海及其辐射的太湖地区，不仅为国际媒体所关注，也有大量零散的武装力量可供整合；而南京则是战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后来又成为汪伪的统治中心，沪宁间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他认为京沪杭地区不仅是蒋介石集团的利益所在，也是自身事业发展的绝好机会，有着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淞沪会战和南京沦陷后的第一时间里，他动用各方关系迅速建立起了作为军统武装的忠义救国军支部一淞沪指挥部和南京行动总队，并且不断进行扩编。

一、淞沪指挥部

早在1938年春，阮清源、鲍步超等人就来到沪宁收容整编散落在敌后的武装。阮清源以专员身份进入澄锡虞地区，对当地部队进行监督指导，先后编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五、六、十等几个支队；鲍步超到达浦东后，在奉贤地区成立了专员公署，下设参谋、副官、军需、政训四处，由周海寰任参谋主任，徐展任副官主任，钱新悦任军需主任，王昌杰任政训主任，召集人马，编成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三、四、八三个支队，分布在奉贤、南汇、川沙等地区。这些部队在太湖附近活动，骚扰偷袭敌伪的据点，破坏敌人的交通补给，并伺机捕杀汉奸及少数外出扰民的敌军士兵，是接下来淞沪指挥部的基本成员部队。

1938年6月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接替了前别动队教导总团的指挥权后，教导总团部分重要干部就奉命挺进上海，筹划成立淞沪指挥部。1939年3月1日淞沪指挥部正式在上海成立，指挥官由当时忠义救国军的副指挥杨蔚兼任，副总指挥何行健，参谋长徐志道，军需处长刘弋斯，副官处长葛谷光，特务大队张大同，军事特派员杨卓夫。淞沪指挥部于1939

¹ 一说7月辞，参见《戴笠年谱》，见《江山文史资料》第10辑，第24页。

年5月底由上海迁至江阴，另在上海成立办事处，主要担任对浦东方面部队的联络。在成立淞沪指挥部的同时，忠义救国军也将重心从浙江孝丰转移到江苏太湖附近，总指挥部由孝丰移至宜兴，9月28日，俞作柏更亲自来到宜兴指挥部队活动。

在此期间，在阮清源、鲍步超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忠义救国军在沪宁地区吸收了大批愿意接受改编的地方武装；同时，限令无名义的游散部队及伪军主动投诚反正，逾期以土匪汉奸论罪，永不收编。软硬兼施之下，太湖周边的零散武装一时纷纷投向忠义救国军。

淞沪地区的武装部队一时齐集于忠义救国军部下，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这些部队大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干部素养不够水准，为整饬军队风纪，使忠义救国军正规化，淞沪指挥部指挥官杨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在部队中建立起了参谋业务，派专员到各个部队，进行监督和辅导。其次，为了奠定澄锡虞地区党政军合作的基础，于1939年8月15日召开澄锡虞三县党政军联席会议，达成一致抗敌的共识¹。同时，组织部下对日本广野师团实施心战，印发忠告书，宣传“日本军队士气颓丧，纪律废弛，不堪再战”，而“中国国力日充，兵力日强，不可轻侮”，“中日两国和平必须尊重两国民意”²等，以此函告广野太吉，并盼其转告日本内阁及日本军人，以此瓦解敌人的军心士气；再次，他组织建立情报网，传递哨，密切注视日军的举动³。他还一些重要市镇公所设立意见箱，收集群众对于该军或三县党务行政等相关事宜的意见和建议。

在军事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在浦东、高淳及澄锡虞等地区与日军也进行了多次作战，牵制了日伪的兵力。如发生1939年7月发生在无锡附近的璜塘之战就异常激烈，指挥官杨蔚积极迎战，在战斗过程中击毙了日军100余名⁴。类似的这种游击战在敌后给日军及伪军以相当的打击，也鼓舞了当地老百姓的抗战热情。

到1940年1月5日，总指挥俞作柏电令淞沪指挥部率领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各支队，转至孝丰基地整训，杨蔚随即召开重要干部会议决定：非调训部队仍留在原基地继续活动，调训部队分为二期转进至孝丰集结整训。

上海办事处至1940年2月22日撤销，另成立京沪线政治特派员办事处，刘人奎为主任，办理淞沪指挥部结束事宜。3月，遵照金华会议决定，实施缩编整训，淞沪指挥部至此撤销，以淞沪行动总队形式在浦东地区活动。

二、南京行动总队

军统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投敌之后，南京区受到严重损失。戴笠自请处分后，让俞作柏重新选派人员，到南京开展活动，要求做到“有声有色，做出成绩”。1938年1月，俞作柏挑选管容德为忠义救国军南京情报组上校组长，并命管立即到南京开展活动。

管容德，又名徐禧、苏我民，浙江黄岩人，原系南京首都警察厅的副督察长，浙江警官学校侦探学教官，是个军统分子，和戴笠关系也比较密切。在接受任务之后，很快联络了一批人，在浦口设南京情报联络地点，在1938年2月中旬成立南京行动总队。管容德在当地被称为大老板，而有二老板之称的王锡三，不但当过原首都警察厅刑事侦缉队下关分队的副队长，还投拜于青帮门下，在当地拥集了一批颇有实力的人物。南京行动总队主要就是王锡三利用帮会组织为骨干，从江浦、六合、滁县收集起来的散兵游勇。因此，南京行动总队也可以说就是军统和帮会合作的一项产物。

管容德和王锡三合伙后，把南京情报组迁到瓜埠，在瓜埠正式成立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并选择瓜埠老鹰窝作为总队部办公处⁵，指挥管容德，副指挥贾维禄。总指挥部又派

¹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169—177页。

²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161—162页。

³ (台)乔家才：《淞沪指挥部杨蔚》，《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中外杂志社1981年10月再版。

⁴ (台)张芾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初版，第183—184页。

⁵ 杨正明：《军统特务在六合活动始末》(上)，《六合文史资料》第1辑，第130—133页。

督察袁灿协助管理，对南京行动总队进行整顿。经过发展，南京行动总队共组成五个支队，三百余人，由王锡三负责指挥第一支队，第二支队指挥许恒臣，辖三个大队，第三支队指挥稽兴才，辖二个大队，第四支队指挥叶善金，辖三个大队，第五支队袁灿，辖三个大队，分布在南京六合地区。

这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对于支持国民党在南京附近建立秘密市党部、以及对敌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南京成为汪伪政权的政治中心之后，日仍在此强化了高压统治，因此忠救军南京行动总队在南京市区附近活动受到的限制和防范也不断加强，他们只能在保存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再筹划其他任务配合抗日行动。

1938年3月，日军在南京制造“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首领，名义上统辖华东。军统局南京区瓜埠组为打击该伪组织，于7月25日派出行动人员8个小组，在全市实施行动。上午9点多，他们冲入伪市政府督办公署，分别在秘书处、公务科、卫生科等处投掷手榴弹，击毙伪署职员数名，任援道也受轻伤，当夜避往苏州；同时他们也在伪维新政府立法院、教育部、内政部等机关投进手榴弹数枚。

按照军统局和总指挥部的要求，管容德指挥手下在南京下关车站、白下路小火车站及日军俱乐部埋置过炸弹，在南京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谋刺过看戏的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和褚民谊，还在贡院街部署阻击乘坐轿车的汪伪南京市长高冠吾等¹。

在南京行动总队的辅助下，1939年6月10日，南京区在敌领事馆下毒，使得日谍船山、宫下玉吉、三浦大佐即时毙命²。

1938年9月，管容德指挥所属一部阻击了从六合县城前往瓜埠扫荡的100余名日军，共毙、伤日军10多人，最后，副中队长小山中尉带领残部狼狈逃窜³。

这些活动发生在日汪的政治中心，虽然在表面上收效有限，但其政治意义不容忽视，它表明了蒋政府对日汪决不合流的态度，也造成了日伪汉奸一定范围内恐慌，对日伪起到了相当的警告作用。

此外，当时南京行动总队还负有遏制新四军发挥发展的任务。在新四军尚未进入六合县境的时候，管容德就接到上级对新四军“严加防范”的命令，要南京行动总队配合“地方友军”通力协作，消灭新四军于立足未稳之时。管容德接到命令后，即开始加强对新四军动态情报的搜索，并在句容天王寺设立直属情报站，派西路指挥刘广，带领特务队不断袭扰新四军。管容德的妻子、宣传队长孟芳也率领队员四处活动，向各乡镇保长、民众宣传“不准听新四军的宣传，如果有人暗中帮新四军做事，一经查出，一律按军法严办”⁴。到了1940年2月，南京行动总队与新四军发生摩擦，在马集的对抗中溃不成军；4月之后在连续遭到中共苏皖支队、县独立团在王子庙、大开门陈两地的沉重打击之后，南京行动总队陷入了一个低潮。5月下旬，管容德带领残余部队数十人向江浦县一带逃窜，在水家湾附近被投靠日伪的郑德钊拦路袭击，管容德在乱中枪杀了王锡三，逃出了六合地区。

因为管容德为人脾气暴躁，嗜杀如命，南京行动总队中军统和帮会成员又互相倾轧，所以总体来说，南京行动总队的抗日成绩还是比较有限的。管容德一离开，行动总队所属的几支部队的大小头目立刻叛变投敌，各霸一方，先后在瓜埠、东沟、八百、新集、程桥等地设立据点，为虎作伥。南京行动总队的番号因此一度撤销，管容德交出兵权，被改派为句容县长。原行动总队督察徐殿庭（又名洪天放）代理队长，重新在南京周边重新蓄积力量。

三、打拉结合

日军占领上海之后，扶植原国民党中统局叛逃特工李士群等人在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

¹ 杨正明：《军统特务在六合活动始末》（上），《六合文史资料》第1辑，第133页。

²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100页。

³ 杨正明：《军统特务在六合活动始末》（上），《六合文史资料》第1辑，第136页。

⁴ 杨正明：《军统特务在六合活动始末》（上），《六合文史资料》第1辑，第134—136页。

号成立特工总部，与日军特高课狼狈为奸，对国民党在上海的一切组织极尽打压破坏之能事，其中由张劲庐负责的第三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忠义救国军。军统及忠义救国军驻上海办事处曾经遭到严重破坏，上海潜伏区情报组长和助理书记刘芳雄、王方南以及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等人都曾被捕，经戴笠出钱买通了租界的探警才先后获释，被次第调往香港、重庆。当时军统人员被捕后投敌的也有不少，如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陈明楚，投敌后出任 76 号第一处处长，而上海区区长王天木也公开落水当上了汉奸，军统在上海区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支离破碎。

为了重建军统在上海的组织，整顿忠义救国军，戴笠曾亲自嘱咐何行健以驻沪特派员名义成立淞沪指挥部，并提醒何行健“此次赴沪肩任艰巨，务请多方策励诸负责同志，始终站在三民主义救国救民立场，秉承领袖旨意，坚决抗敌，爱护人民。对过去沪办事处派往各支队之人员，如有不知自爱不识人体者，应立即议处，不可丝毫顾忌与姑息也。”¹这虽然可以说是戴笠在工作上对何行健的慰勉，换个角度，其实也是对何的一种警示。然而，何行健可能到最后也未能领会道戴笠的良苦用心，在受到汪伪特工总部软硬兼施的威胁下，他就向日汪投降，接受了伪政权授予的“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司令”番号，并自封陆军中将。他的落水随即产生了“多米诺”效应，其所属部队也随即投向了伪政权。

忠义救国军高层人士以及军统组织人员投伪，忠救军跟随何行健投敌的手下更被夸大五万人，军统组织瘫痪，直接影响到了军统各系统的正常工作，并且范围还有不断扩大的迹象。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戴笠开始布置暗杀，对落水投伪的高层官员进行严厉打击，杀鸡儆猴，影响较大的是暗杀王天木、何行健等人一案。军统暗中收买了王天木的随身警员马河图，命其伺机暗杀王天木等人。1939 年 12 月 24 日，圣诞节前夜，何行健、陈明楚、王天木等人随带副官和保镖，从上海静安寺百乐门舞厅吃完晚饭，到沪西兆丰夜总会跳舞，大家玩了一阵，一同步出舞厅休息，何行健在前，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马河图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开枪射击，何行健、陈明楚当场毙命，王天木吓得钻进沙发背后，躲过了一劫，回到 76 号后仍因涉嫌而被扣押。这个事件使得投伪人士人人自危，在很大程度上也警醒立场不坚定、态度摇摆之人。

此外，戴笠也认识到，汪伪特务活动的手法无非是利用军统被俘人员来破坏打击军统，或者直接拖人下水，以达到“损人利己”的效果。因此，除了采用暗杀手段，他也尽力收买和拉拢汪伪的汉奸特务，对他们进行反收买，或出重金利诱，或对其既往不咎、使之将功赎罪，由此进行除奸活动。有些部队原来就是蒋介石的军队，投向了汪伪，经策反后又被动员了回来。当然，在当时异常复杂的环境之下，为了生存，也不乏脚踏两船的部队。

国民党对汪伪内部的打击和拉拢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到了抗战后期，中国战场形势有了转变之后，汪伪手下开始主动与蒋介石一方联系，为自己铺好后路，作两手准备，因此实际上蒋方到最后对他们也已经是重拉而不重打了。

四、与新四军关系

全国合作抗日形势即成，南方红军游击队随即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北伐时叶挺第四团的“铁军”传统，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在武汉成立军部，后移驻南昌，准备整编后开赴敌后抗日。1938 年 4 月，新四军陆续向皖南、皖西集结，为了便于靠前指挥，新四军军部到移驻到安徽歙县岩寺，并于 4 月底通过了三战区的点验。

1938 年 5 月 4 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出了一份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应迅速挺进敌后，在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组织好游击战，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游击战争；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新四军同时也要在敌后游击作战中消耗日军、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

¹（港）申元：《戴笠轶事》，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 年出版发行，第 175 页。

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¹在此前提下，新四军派出东进侦察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东进过程中，先遣支队在镇句公路上的韦岗设伏，对日军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所属30余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击毁了日军汽车4辆，击毙日军少佐和大尉梅泽武二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缴获长短枪20余枝和军用品一部。韦岗首战告捷，奠定了其进入江南的基础。了解了地情民情之后，陈毅、傅秋涛率的第一支队和罗忠毅、王集成率领的第二支队相继向溧水当涂等地进发，并在茅山和当涂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在敌后开展民运工作，迅速打开了发展的局面。

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国共摩擦随即日益频繁，并不断升温。短短几个月内，双方摩擦频繁，并从支队小规模摩擦逐渐扩大到师级规模战斗。9月8日，忠救军淞沪指挥官杨蔚率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共2000多人在无锡安镇一带向江南抗日义勇军一部进攻。双方在无锡以东的白丹山、胶山一带展开大规模战斗，激战终日后，江抗撤出战场，向西转移。部队行进到江阴马镇时，与忠救军遭遇作战，六团副团长吴焜牺牲。9月17日，三战区以“越界”违反军令、政令密令第32集团军“剿办”江抗。21日又电令叶挺撤回六团。24日，王必成率新四军老二团赶到江阴、周庄增援，决定与国民党军决战。此时国民党第63师开始东渡太湖，东路的形势向国民党方倾斜，一场万人规模的大战一触即发²。9月29日，江南新四军负责人陈毅赴国民党江南行署与行署主任冷欣谈判，拟定双方同时撤兵的解决方法。10月初，江抗撤至扬中整训，留下了36名伤病员在阳澄湖养伤，也就是后来《沙家浜》的素材。

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鉴于东路地区抗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10月后重新建立江抗，坚持在东路进行武装斗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新江抗在东路地区又发展到400余人。随着新四军实力的发展壮大，忠义救国军与它的矛盾也不可避免的扩大化。

五、在金华的两次会议

忠义救国军在俞作柏任总指挥的阶段，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许多流散在沪宁地区的官兵以及地方武装被收编入队，忠义救国军的成分也随之复杂起来。有的地方武装接受忠义救国军编制只是为了获得补给，明确提出受编不受调；也有派往各支队的专员与支队负责人互相猜忌争斗，为支队的控制权而互相排挤；还有的部队与日伪眉来眼去，甚至直接率部投伪，影响了部队抗日的整体形象。此外，忠义救国军也与三战区有着矛盾和摩擦，蒋介石为了敷衍三战区顾祝同的面子，曾把戴笠找去训斥，责令戴笠对忠义救国军加以约束。

为了整顿所属部队，1939年11月28日，戴笠在金华召集忠义救国军主要干部，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对当时的人力财力及所处的环境与今后的全盘政略战略的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计划。主要确定了两大工作原则：一是确定以浙江长兴、安吉、孝丰之三角地带为该军游击根据地，以太湖为中心将江阴、无锡、常熟等县为前进游击区，收容流散国军，策动伪军反正，同时布置情报网，并发动民运，捕杀奸伪。二，在不增加中央特殊负担的情况下进行整训整编工作³。

此后，戴笠一边准备对忠义救国军进行整编，陆续扩编为4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辖26个支队又2个直属大队，总兵力29611人；一边就开始着手调整人事，1940年1月军统大员周伟龙被任命为总指挥，俞作柏调为军委会中将参议。

1939年12月戴笠在金华又召开了一次5省特务头目参加的“北山会议”（又称东南五省会议），这次会议把正准备粉墨登场的汪伪政权和驰骋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看成是两颗眼中钉，自谓要进行“夹攻中的奋斗”。周伟龙等认为，京沪杭三角地带必须牢牢地控制

¹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7—99页。

² 参见郁振国：《“太湖游击队”的战斗历程》，戴国兴：《论“江抗”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党史资料与研究》2005年第3辑。

³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15—16页。

住,既不能被日汪占据,也不能让新四军利用茅山山脉作为抗日根据地而进行渗透。为此,戴笠提出在上海建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实行所谓一元化的领导。在统委会下成立对日汪的情报收集和策动反正的机构,文强时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受戴笠委任为该策反机构主任委员,主持具体事务,忠救军政治部主任即交给罗静芳代行¹。上海策反委员会主要负责策反和情报的搜集,各地的行动队及忠义救国军各支队等就作为武力支持配合军统组织的各项活动,对日伪进行打击。策反委员会中的不少委员曾在忠救军中任过职,而忠义救国军的任务中就有配合策委会的重要内容。

这两次会议确定了忠义救国军今后的基本动向和主要任务,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多方势力在太湖、皖南地区纵横捭阖,形成了一幅特殊的历史画卷。

第二节 湘周壮大 插入敌后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黄埔四期。1927年宁汉分裂的时候,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下任宪兵营长,驻扎在汉口。戴笠在汉口搜集情报时被宪兵部队逮捕,戴以同学身份求见周伟龙,周不但亲自掩护戴笠脱险,还按照戴笠的提议,弃官逃到南京投奔了蒋介石,两人因此结拜并成为至交,周伟龙更由此成为戴笠最早的发家班底“十人团”²成员之一。1940年1月周伟龙接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

一、孝丰整编

1939年春,戴笠派杨蔚为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官,靠阮清源在澄锡虞地区建立的游击武力和敌人周旋。这时忠义救国军在沦陷区已经发展到4个纵队,26个支队,总兵力29000余人,分布于浦东、太湖及京沪杭铁道、京杭国道一带。周伟龙接任总指挥职后,将忠义救国军缩编成三个支队(又称教导团,均按步兵团的新编制编成)以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一个淞沪行动总队(每个行动总队官兵不超过700人),一个特务大队,一个军官训练队。3月,除了南京行动总队仍留驻江浦就地整训,并与敌伪周旋外,均集中孝丰整编训练,总指挥部由宜兴移回孝丰,以便就近督导。编余部队拨交三战区顾祝同,淞沪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四纵队,及原有个支队,大队番号统统裁撤³。广德战斗后,总指挥部由孝丰移到广德王岭山中。

周伟龙在整编现有部队的同时,一直主张扩建新军。他截留三个教导团的给养和经费,又在苏浙皖三省边界设立办事处,专门在各边界水路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过往行商过客强行征税,美其名曰:“取之于奸民,用之于建军”。其中派少将高参文德赴湖南招收志愿军官组成第四团,以文德为团长,招收了约2000名新官兵。又派少将高参石树勋在浙江兰溪诸葛镇上就设立了一个忠救军后方办事处,召集失意的旧军官,委以军衔,再由这些军官各自去招收散兵游勇。到1940年冬,招收了7个独立营的官兵后,后方办事处就随即撤销,官兵一起开赴安徽广德整训。1941年夏初,这7个新兵营改编为忠救军第五、第六两个团,第五团团长江龙是周伟龙的外甥,第六团团长江天存则是周伟龙黄埔四期的同学。

周伟龙在职期间也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培训各种基层干部。他曾在浙江孝丰的章吴村办了一个军官队,先后共培训6期学员,约1200余人。据曾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并任有一定职务的翁养正说,第六期学员都是沦陷区招来的青年学生,共约500余人,大多都有高小毕业和初中程度,队长由周伟龙自兼,由教育长周有为负实际责任。下设教育处,处内有军事、政治、技术等教官10多人,教育副官2人,军需等事务人员10多人。处一下分四个队,第

¹ 参见文强、沈忠毅:《军统与汪特在上海的一场争斗》,《文史资料存稿精选编精选3 蒋记特工揭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60—161页。

² 十人团有周伟龙、王天木、唐纵、方超、张炎元、徐亮、赵世瑞、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和王兆槐等十人。

³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17页。

一队，又称军官队，上校队长薛涤愁，第二队，又称政工队，上校队长汪瑞文，第三队，又称技术队，队长言中信，第四队，又称军士队，队长钟祥桢。这个军官队培养出来的各期学生，基本都成为了忠救军各基层组织的骨干。此外，周伟龙还在孝丰章吴村玉皇山办过 3 期“干教队”，主要是对新参加忠义救国军的外来旧军官暗中进行政治考察与拉拢，共办 3 期，学员总人数约 300 人¹。

二、四路挺进敌后

1941 年 1 月，忠义救国军在孝丰整编完毕，按照游击京沪杭区敌伪及清剿苏南地区“歼匪”之作战企图，将苏南浙西沦陷区划分为几个区，分四路重回京沪沦陷区，继续敌后游击。

第一路“苏嘉沪挺进队”，以第三支队、淞沪行动总队、教导第一总队等三个单位为骨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挺进，总指挥为阮清源。第二路“澄锡虞挺进纵队”，以第一支队为骨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挺进，总指挥是郭墨涛。第三路“锡武宜挺进队”，以第二支队为骨干，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常州、江阴之间的地区挺进，文德为总指挥。第四路“京丹溧挺进队”，以南京行动队为骨干，进出南京、江浦、丹阳等地，总指挥为管容德。

以第一路为例，阮清源部从孝丰出发挺进苏嘉沪敌后，收编了北厍张文奎部和陈耀宗²余部等散落江南一带的杂牌军，成立了 17 个支队和 1 个“独立营”，将忠救军司令部设在吴江县莘塔，统领国民党在苏南地区的军事组织。又成立吴江县政府路东办事处(苏嘉路东)，由阮清源兼任办事处主任和军事组长，第六区区长凌元培任民政组长，忠救军政治部主任张国桢兼任教育组长，柳甦为办事处主任，除了经济组设在芦墟、由组长黄麟书负责之外，其他组都设在莘塔。

忠救军利用交叉纵横的河港作为掩护，在附近地区进行抗日宣传、情报活动和武装斗争。相对于日伪军队的祸害以及各种游杂部队的骚扰摊派，阮清源率领的忠义救国军算是一支比较正规的部队，军纪较好，在芦墟进行过一些抗日活动，在当地百姓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³。他们在芦墟南栅港野猫圩伏击过日军，杀伤了一批措手不及的日军，迫使其退回东南方向，胆大的市民还曾隐蔽在南栅油车坊和轮埠观看；在嘉善西塘及长生桥等地他们也曾袭击过日军。阮清源部还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组织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队，在 1942 年 1 月 14 日，即当年的除夕晚 9 点同时行动，对在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日伪实行了突然袭击。纵火、惊扰两队人员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事先潜入并分散到租界及其他各处，选定纵火及燃放鞭炮的地点，等到预定时间同时纵火及点燃鞭炮，造成上海市区秩序大乱。爆破队分作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南翔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莘庄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集中了该部神枪手的袭击队，同时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驮马多匹⁴。这次“除夕攻沪市”的行动震惊了中外，使得日伪胆战心惊。

除了进行一系列的抗日斗争之外，阮清源也比较重视宣传，其政治部在芦墟东栅编印三日刊《正气报》，该报系 16 开铅印，3 天 1 期，依托忠救军明暗渠道，发行至苏嘉沪 8 县。同时还设立了忠义小学、正气中学等。40 年代以前，芦墟仅有少数人家有条件送子女去吴江、苏州、上海、松江、嘉兴等地上中学或师范。1941 年，忠义救国军控制吴江县东部及

¹ 参见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1）政治军事卷（上）》，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352—353 页。

² 陈耀宗，人称“陈瞎子”，国民党 735 团团长，在芦、莘、厍、周地区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活动，柳亚子先生曾在《健云侄为余谈故乡事》中褒扬了陈耀宗。1941 年初，陈部被阮清源整编后，4 月解甲赴沪。

³ 沈文浩：《阮清源及芦墟地区抗日活动侧记》，参见政协吴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吴江文史资料》第 15 辑，1995 年，第 28 页。

⁴ （台）《游击能手阮清源》，见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站》第二集，中外图书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再版，第 134—135 页。

周边地区后，于8月在西栅当栈房(今中心幼儿园南边)开办的清华中学，设3个年级，招收了近100名学生。学校在初二、初三年级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参加填表的有20多人。期间，团员带头积极宣传抗日，排演话剧。194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芦墟镇还举行庆祝大会，盛况空前，不少从上海租界撤出来去皖南的青年学生，在途径莘塔、芦墟的时候与当地青年联欢相庆，气氛热烈¹。

吴江地区紧靠上海，驻扎在此的忠救军一部也曾护送从上海撤出的美英领事人员及汉冶萍煤矿英籍工程师等3人越过苏嘉铁路²，时任北圻伪镇长的印国楨因参与其中帮助他们出逃，后来被日伪侦察获悉后遇害了。³据当地居民说，当时路过当地的几个外侨中，有一位是记者，逃离陷区后到重庆写了一篇“脱险记”，记述所历的艰险，并感谢中国军民的帮助，还把芦苇库周地区誉为“小重庆”，意为抗战前方相对稳定的地区⁴。

由于阮清源在敌后表现比较突出，对苏南地区也相当熟悉，在周伟龙兼任别动军司令职后，阮于1942年4月由苏嘉沪挺进纵队调回指挥部任副总指挥，6月代行总指挥职。

三、与别动军关系

别动军也是军统局下的一支武装力量，最初是由蒋介石在1940年3月的参谋会议上，提出组织成立的便衣混成队。戴笠组织各战区混成队编练处，由军统局选派长于军事的高级干部担任编练专员，在每一战区派遣编练专员1人，教官数人，负责训练该战区内的便衣混成队，各战区共成立将近一万人的特种武装部队。训练期限为一个月，主要内容为侦察、伪装、通讯联络、及城市暴动等。训练完毕后，改编为督导组，以编练专员任督导组长，协助各战区司令官办理指挥便衣混成队。到1941年12月8日，军统局奉命和英国合作，进行对敌破坏工作，于是将各地便衣混成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简称别动军，受军统局直接领导。

1942年1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另任命尚望为别动军参谋长，翟荣基、杨遇春、徐光英、何际元、杨蔚、徐志道、郭履洲为别动军各纵队指挥。为统一指挥敌后的游击工作，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拨交别动军司令统一指挥。

中英合作夭折后，作为隶属于军统之下敌后武装，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加入到中美合作所，一起接受美国训练和装备。因为二者同样是在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工作性质和形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二者人员也互相牵扯不清，如徐志道、杨蔚、郭履洲等人都曾是忠义救国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又加入到别动军中担任纵队指挥，周伟龙更是兼任别动军司令和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二职，因此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的关系非常密切。1945年日本投降后，别动军所属7个纵队及并入军统控制下的其他特务武装，共编为8个交通警察总队，与忠救军编成的10个总队合为18个总队，假护路为名，全部投入反共内战。中美合作结束后，别动军和忠救军也一起编入交警总队。

另一方面，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各自独立性也很强。首先，两者部队的主要构成不同。别动军主要是各战区的便衣混成队组成，而忠义救国军更多的国民党部队的零散武装以及地方上的散兵游勇，且有一定的帮会背景。

其次，两者活动的地点和工作内容也各有侧重点。别动军分布较广，南至粤桂，北至晋

¹ 陆景宣、金冶：《追忆芦苇库大屠杀》，见江苏省吴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编印：《吴县文史资料》第7辑，第99页。

² 参见周德华：《吴江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综述》及《抗日英烈录》，参见政协吴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吴江文史资料》第15辑，1995年，第69页。

³ 《抗日英烈录》，参见政协吴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吴江文史资料》第15辑，1995年，第3、69页。

⁴ 陆景宣、金冶：《追忆芦苇库大屠杀》，见江苏省吴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编印：《吴县文史资料》第7辑，第97—98页。

绥，在全国各主要交通路线都有分布，以打击和牵制日军、协助国民党军队作战为主，而忠义救国军侧重以武力为后盾，策反伪军，组织民众，确保京（南京）沪杭三角地区的安全。

总体来说，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在人员构成和武器装备上有着相似相通之处，也都是围绕着军统局主要职能范围活动，不过他们承担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罢了。

· 第三节 换阮任马 旨在东南

周伟龙调任别动军总司令之后，由阮清源代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一职。虽然此后在军内人事上进行了极大的调整，但忠救军的基本任务和职能仍旧没变。1943年6月，马志超接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则预示了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大转变。在这一阶段，忠义救国军进入中美合作所进行培训并装备美式武器，负有配合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抗日，迎接美军登陆的任务。这既是戴笠为忠义救国军规划的一个发展蓝图，也为忠救军的最后编入交警总队奠定了基础。

一、日伪的扫荡

忠救军四路挺进敌后以后，他们在太湖附近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日伪和宣传抗日的活动，因此引起了日汪政权的不安。尽管日汪政权对他们进行多次扫荡，但抗日力量没有减弱。同时，中共新四军也在苏南地区站稳了脚跟。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军事力量，日汪于1941年初开始酝酿大规模的“清乡”运动。

1941年6月10日，汪伪在南京召开了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划定了“清乡”区域，对实施“清乡”的各项活动作了部署。至1942年夏期间，日汪在苏南地区的苏、常、太地区和锡、武、澄地区进行了第一阶段的“清乡”，采取闪电战术，在这些地区设立据点，构成封锁圈，继而进行政治“清乡”。

向京沪沦陷区挺进的四路忠救军，都遭受日伪的阻击和扫荡。其中阮清源指挥的第一路推进较快，在江阴、吴江等地扎下了根，并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江苏省政府因此委任阮清源为江苏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管辖川沙、南汇、上海、奉贤、金山、宝山、青浦、松江8县及崇明岛各地¹，在当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也正是因为如此，阮部遭受日军打击也最大。

1942年2月21日，日伪借搜查忠救军及抗日青年学生为名，集结了在苏州、吴江、嘉兴、嘉善等重要据点的兵力，对分驻芦、莘、厍、周等地的阮清源部及其当地居民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大扫荡”，以期铲除忠义救国军在当地的影

在这次扫荡中，北厍因为曾被忠救军作为重要基地，不仅架设过电台，还开办过训练班，被列为日军的重点打击对象。而在日军扫荡前夕，忠救军来不及应战，只是匆忙将收发报机转移到镇西蛇埭港村，接着就丢下包括生活用品在内的全部东西撤离了。村上群众怕受牵连，将部分物品掩埋，收发报机及一支手枪扔在东长荡里。后来因为汉奸告密，被日军得悉，日军在3月6日强令群众下手捞枪及发报机未获，于是迁怒于当地群众，当场屠杀了20多名无辜百姓²。

这次对芦、莘、厍、周地区实行“大扫荡”，日伪杀死杀伤我军民一万多人。阮清源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突然袭击，不敌而溃。该部一营曾在21日与敌在天凝庄激战，忠义救国军伤亡严重，营长戚森突围不成，先杀妻及子，继而殉国³。敌工队的陶姓女士（无锡人），也骂敌成仁⁴。阮清源部下多退入孝丰、安吉地区，无力再做抵抗。阮清源也在此次

¹（台）乔家才《浩然集》（一），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342页，转引自洪小夏：《关于上海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²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1995年编印：《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第198页

³参见《叶天荫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六五一53。

⁴沈文浩：《阮清源及芦墟地区抗日活动侧记》，《吴江文史资料》第15辑，第29页。

围剿中与总部失去联络将近一月之久。他们除损失了数十台电台，数年间发展起来的外围部队和原部队组织也遭到重大破坏。结果除沪杭铁路以南一部未受影响外，其余皆陆续突围，退入太湖。

而第二、三两路在挺进陷区的过程中，与新四军发生摩擦，有一部北渡长江，转在泰兴等地活动，到1942年又回到丹阳、金坛地区从事游击活动。

二、重整旗鼓

1941年初，忠救军分为四路向苏南敌后挺进，遭到了重大的损失。1942年6月，周伟龙另任别动军总司令，由阮清源代理忠救军总指挥，负责忠救军实际事务。

阮清源上任后，继续对忠义救国军补充兵源。他一面报请军统转拨浙江军区的壮丁5000名；并派出浙籍军官在自己的家乡招收所谓的志愿兵。结果，军统局上报经批准调拨3000名，江西军区和浙江军区各拨1500名。共补充约6000名。

在人事任免方面，阮清源任职后，大力排斥周伟龙的亲信湖南籍军官，如撤职关押原第五团团长、周伟龙的外甥黄龙；惩办总部人事课长杨国屏等一批周伟龙最为亲信的人。同时，他起用被周伟龙压抑过的浙江籍军官，无条件地开释原被周撤职查办、尚在关押中的原第一团中校营长安我华，并以原级升任新四团代团长，并派其赴浙江嵊县招收家乡人成立新一团；提升浙江籍中级军官如余钺、叶鹤、沈之岳、吕逸民、翁养正等人。

1943年春，为便于接受中美合作所训练与装备起见，忠义救国军再次整编，共编成四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三个步兵团，均按正规军新编制编成）及一个特务营，一个搜索营，一个军官队，一个电讯总台，与南京、淞沪、浙东、浦东、澄锡虞等五个行动总队。

1943年6月，因日军窜入广德境内，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转移到安徽宁国万家桥，所属各纵队也分别转移防地。除担负防务的部队外，基本都集结整训，分驻在总部附近地区。在此期间，忠义救国军为了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作战。

三、马志超出任总指挥

过去一种说法认为，忠义救国军在三战区与顾祝同的部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为此，蒋介石曾一度考虑是否要撤销忠义救国军来保全顾祝同的面子，以稳定三战区的局势。戴笠不甘落后，为此求教于胡宗南，并派胡的手下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重新彻底整顿忠义救国军，才使其得以保留下来。不过，忠救军与三战区的重重矛盾固然是事实，忠义救国军本身却也存在着巨大的内外危机，才使得忠救军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

首先，这与上一任忠救军总司令周伟龙决策失当有关。周伟龙接任总司令一职后，为了巩固自己在军内的地位并重新调整人事，放弃了原来已经初具规模的澄锡虞游击根据地，将部队大部分拉到孝丰整编，使当地留下了一个几乎真空的地带。此举主观上是为了对收编的零散部队进行整编训练，客观上却使得忠义救国军放弃了既有的根据地，缩短了战线，局限在孝丰山区。另一方面，忠救军离开澄锡虞地区后，新四军在当地不断发展壮大，等忠救军整训完毕，再想回到原来的根据地就没那么容易了。

此外，周伟龙个人刚愎自用，用人惟亲，自任总司令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忠救军上下要职基本都换成了自己的湖南同乡，因此当时军中就有“苏浙行动委员会，湖南忠义救国军，湘乡总指挥部”的谑称¹。阮清源代理总指挥后，又进行报复性的人事换班。在这种频繁的大规模人事调动中，忠救军内人心涣散，各自为政，免不了产生巨大的内耗。

更为严峻的是，自1941年夏开始，日汪就在苏南地区进行了持久而大规模的“清乡”运动。日伪划分“清乡区”进行军事扫荡，再构筑封锁网，隔绝“清乡区”内外的联系，分割和“清剿”其中的各种武装力量，并且设置检问所，牢牢把住各个关卡的人员流动。在这

¹ 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1）政治军事卷上》，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

种情况下，忠义救国军不仅受到日军和汪伪军队的严密监视和围剿，还夹杂在国民党主力部队和新四军之间不断的争斗和摩擦，生存空间异常狭小。

在内忧外患种种困扰中，戴笠任命马志超为新一任总指挥，其实也是向蒋介石表示了对忠义救国军进行彻底整顿的决心。

四、布阵东南

马志超，陕西人，黄埔一期。西安事变时，马志超是陕西省会警察总局局长，后来到胡宗南手下做师长。据说马志超是一个只知服从上级，外貌憨厚但实则狡诈的人，因此其品行和才能并不被戴笠看重。但因为胡宗南的推荐，同时戴笠考虑到马志超的黄埔出身也更容易为蒋接受，因此，马志超于1943年5月被任命为忠义救国军的又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在他10月到差之前，参谋长郭墨涛代行其总指挥职。

马志超在任期间，忠义救国军的主要任务，是以武力为后盾，组织民众，避开敌军主力，相机袭击，以确保京沪杭地区。其间，为有效控制浙赣铁路北段，杭甬铁路西段，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及长江下游地区，牵制日军，创造良好的反攻形势，忠救军先后进入中美合作所整训，接受美式武器装备，策应美军登陆，同时，在广德、孝丰地区与粟裕所部对抗，防止新四军部南犯。中美双方商定对忠义救国军作强势备战部署，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铺设忠救军前进指挥所，由马志超坐镇，节制温台、淞沪、鄞杭三个指挥部，指挥江浙两省所部行动。

（1）淞沪指挥部

1944年秋，戴笠鉴于大战形势有所转化，并准备在东南沿海策应美军登陆，提出要在东南沿海“组织地下军”，并保举阮清源担负这一使命。1944年冬，阮清源由戴笠陪同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随即被委为江苏省第三行政专区专员兼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接受重任后，奉命回到忠救军选调骨干，1945年2月，在浙江孝丰章吴村成立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和江苏省第三行政专署，组织策应部队。

（2）温台指挥部

温台指挥部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忠救军少将参谋长兼中美第八训练班副主任郭履洲兼任指挥官，浦东行动总队张为邦为副指挥官，统辖中美合作第八班的三个教导营，一个特务大队，一个独立支队，一个水上大队和浦东行动总队，在浙东、浦东、崇明对日军活动。

（3）鄞杭指挥部

在浙江桐庐设立忠救军鄞杭指挥部，派忠救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鲍步超为指挥官，熊国和为参谋长，统辖第三纵队及新一团¹，沿桐庐、富阳线向杭垣挺进，在富春江及杭州湾一带防堵日军。

1945年秋，美军尚未来得及在东南沿海登陆，战争就突然结束了，准备迎接他们的敌后部队也于是转入对各大中城市的接收工作中去了。

第四节 小结

1938年，戴笠辞去总指挥由他人任职，此一人事调动颇能显出戴笠处事的精明，这种对蒋介石效忠和低姿态的交待，无疑能使蒋排除他见，放下多余的担心更加信任戴笠。而戴笠也能抽出更多的精力去经营军统，图谋更大的发展。到1938年10月，特务处前往重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戴笠为副局长，掌握实权，这不仅是蒋介石用以“安内”而重用军统特务组织的结果，从抗战全局来看，也是符合当时急需填补敌后抗战真空的形势的。

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虽然四易其人，但其发展轨迹始终脱不开戴笠的痕迹。无论是在敌

¹ 团长谢相银为伪军投诚。

后联合地方武装、策反伪军、破坏交通、暗杀，无一不暗含戴笠的个人意志。只要是关乎忠义救国军发展，他无不亲力亲为。俞作柏在卸任后曾向毛森说过：“我对忠义救国军的现状并不满意，我们事事都要请示戴先生，每一干部都可以直达戴老板，总指挥无实权，被束住手脚，难以灵活指挥作战，不如从训练基层做起，自己带一支劲旅独当一面，胜过挂名主帅”¹。马志超也曾提到，几年之中，戴笠对他指授与督导的亲笔函电，就有数百通之多²，可见戴笠在军内的地位和影响。对于军内存在的派系问题，戴笠更是运用他一贯的手段，通过频繁地调动人事，来节制各方面关系，以实现自己的操控权力。

此外，忠义救国军主要在三战区的范围内活动，在名义上接受三战区和军统的共同领导，但戴笠对于有关忠救军的人事、经费及行政领导方面牢牢地控制手中，决不容他人僭越半分。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对此曾颇有微辞，并向蒋介石反映忠义救国军“游而不击”，抗敌不足、扰民有余，是十足的土匪。京沪杭地区当时也流传有“遍地有‘定平’，土匪满天飞”³的民谣。为解决两方的矛盾，蒋介石一度想要取消忠义救国军。

当忠义救国军处于存废未决的紧要关头，机遇又亲睐了有所准备的人。随着二战世界局势的迅速转变，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急速挺进，并且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加速日本军队败退。蒋介石迫切希望与美合作，考虑到忠义救国军作为东南敌后重要的游击力量之一，并有美国的支持和武器装备，因此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结果，忠义救国军没有被撤销，反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戴笠对维护以及经营忠义救国军花费了相当的代价与心思，并且为其找到了“最可靠”的保障。最后忠义救国军编入交警总队，在其完成了敌后作战及接收任务后转为正规部队，成为国民党维护全国重要交通干线、用于内战的工具。

¹（港）申元：《戴笠轶事》，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发行，第183页。

²（台）良雄著：《戴笠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4月再版，第199页。

³定平是忠救军的代号，臂章印有“定平”二字。

第四章 戴笠、中美合作所与忠义救国军

戴笠虽然退居幕后，却一直掌控忠义救国军的运作发展，他领导下的军统组织与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合作后，他的事业更步入巅峰。中美合作所成立后，他调派了忠义救国军一部开始整训。经过整训，忠义救国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是在部队整体素质方面，都有了显著地提高，同时，他们作为敌后游击武装的使命也就加入了别的内涵。

第一节 中美合作局势概况

中美合作，确切的说，是美国的海军部门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军统局合作，伴随着中英合作的流产而告成立，在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有着多重的条件的，对于中美双方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中英合作流产

1941年夏，英国派驻重庆的商务代表、英国高级特务安德逊与戴笠联系，表示英国愿在加强中国游击武装方面提供援助。戴笠即调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自江南前线回重庆，代表军统局与英方谈判合作事宜，以军统掌握的武装特务——第三战区忠义救国军和各战区督导组与便衣混成队为基础，与英国特务合作为训练对象。1942年1月，别动军司令部在重庆小龙坎成立，戴笠保举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为司令，统一指挥合作事宜。

然而，中英合作进行得并不一帆风顺。戴笠曾向宋子文说起对英情报合作的状态，“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藉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¹并提醒宋子文说英国特工负责人约瑟克“现在华府有所活动，此人鄙视我国与我绝无好感，乞公注意。”²

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也曾在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³。

由此可见，中方与英方的合作一直互有芥蒂，并不互相信任。后来，英国面对德国的进攻自顾不暇，新马又告沦陷，加上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也与英方意见发生分歧，中英合作遂于同年4月夭折。

中英合作的流产，使得接下来的中美合作趋于可能。

二、中美合作进展顺利

美国本土因为远离战场，且认为日本不敢向其开战，因此最初并不重视东南亚的情报搜集工作。因此，戴笠先前多次派人与“美国情报协调处”协商，希望美国能协助中国加强游击队的训练和装备以打击和牵制日军，都没有结果。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扩张，1940年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5、6月间，希特勒横扫西欧，法国、荷兰投降，英国退守英伦三岛，无力保护东南亚属地，这就为日本打开了侵略东南亚的方便之门，此后，印度北部迅速被日本占领，到1940年11月底，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

¹ 《戴笠致宋子文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现藏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 43, Folder ID: 4。转引自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3月，第353页。

² 《戴笠致宋子文电》，《重庆来电》（1942年1月14日）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现藏于（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Box No: 43, Folder ID: 4。转引自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3月，第353页。

³ 潘嘉钊等编：《戴笠 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4页。

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的对战争形势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转变，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从此，总统着手制订一项严加管制的计划，其目的不仅是要加速对华经济援助，而且要把中国变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有益的盟国。”¹

与此同时，戴笠的情报机构也显示出了其在战争中的价值，因为准确预测了珍珠港事变的爆发，使得向来不屑于中国情报的美国情报组织大跌眼镜，从而开始靠近戴笠，向其示好。在此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将在华的美国情报组织归海军部门指挥。1942年4月，海军部门派出梅乐斯上校来华考查，接洽中美合作事宜。梅乐斯到达重庆后，与戴笠会晤，说明急切要进行气象情报、无线电解码以及在日军沿中国海口河口经常使用的水域中布置水雷的合作。

5月26日梅乐斯等从重庆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视察，看到了在沦陷区内工作的情报人员和敌后武装的活动情况，加深了与戴笠合作的信念。回到重庆后，梅乐斯即决定帮助戴笠训练敌后爆破组的领导人员。戴笠从敌后游击队中挑选了130人集合在重庆接受训练，要求美国海军部供给训练专家和军火装备。到年底，美方已有15人参加训练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正式合作事宜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43年元旦，宋子文正式提议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 SACO。美国授权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战略处处长陆军少将杜诺文、梅乐斯，中国授权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驻美陆军副武官萧勃中校，于1943年4月15日在华盛顿签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方针是：在中国沿海地区、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被日军占领各地区，以中国抗战后方为根据地，使用美国的物资及技术，有效的打击与破坏远东的日本海军、空军、商船及日军占领区的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

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距重庆八公里的磁器口钟家山正式成立，该所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由戴笠兼任主任，梅乐斯担任副主任。所本部设立主任秘书及参谋长，以下分设人事、情报、作战、气象、侦译、通讯、会计、医务、总务等十个组，由中美双方人员分任组长，以中国的广大人力与有利的工作环境，配合美国的新式器材与科学技术，高度发挥人力物力的效用来打击共同敌人。

梅乐斯是美国有名的右翼人物，与戴笠一样仇恨社会变革和共产主义，他曾这样说：“我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消灭他们，我本人乐于从中出一把力。”此外，美国海军和陆军在中国战场战略问题存在一定分歧，为了加强美海军部门在中国的影响，抓牢与戴笠的合作关系，梅乐斯更不惜阻碍和破坏美国陆军的其他计划。

但是，梅乐斯助蒋反共的思想与行为并不经常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实际态度，其个人因素更占上风。这一点在抗战后期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尤为明显。美国派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唯恐中美合作所公开卷入中国内战，曾命令梅乐斯不准中美合作所的任何美国人参加共产党地区的军事行动²。但是，梅乐斯还是带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官兵全力投入了支持反共的战斗，在1945年8月12日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打的电报中，他这样说：“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同他们指定的中国部队指挥官一起出发。全副武装并携带完备的无线电器材。不要把秘密泄露给你们任何外界朋友。尽快把所有可用的武器和弹药交给‘忠义救国军’……并继续提供后勤支援。”8月16日，在日本投降后，梅乐斯又下达了中美合作所美方人员应帮助戴笠的命令。美方人员还武装忠救军的帆船部队，抢占港口城市，以帮助国民党。³

¹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

² 魏德迈致梅乐斯函，1945年8月1日，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6页。

³ 梅乐斯致中美合作所各单位函，1945年8月16日，转引自【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7页。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在促成中美合作上梅乐斯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第二节 忠救军进入中美合作所培训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先后举办了诸如重庆特种技术警察训练班、中美特种技术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中美特种技术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等数个训练班，美方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与精力，而军统局方面则全力配合。

其中，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培训学员的重点，目的是直接训练军统所辖的各类部队武装，从而为实现辅助美军登陆作战及打击日军的目标服务。戴笠与梅乐斯对之十分重视，投入了许多的精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其中第一班于1943年3月创办，由戴笠兼主任，忠义救国军参谋长郭履洲为副主任，主要就是负责整训忠义救国军所属部队，因为设在安徽歙县雄村，因此又称为雄村训练班。

一、雄村训练班

雄村训练班计划举办12期，除军统每期不定额选送人员前往受训外，主要训练驻扎在附近的忠义救国军。训练班内设班本部，正副主任之下，设美国总教官室、教育长室、教务组、秘书室等。此外还设有政训组、总务组、翻译室、会计课、特务连、通讯班、禁闭室、电台、医务所等。班本部驻雄村崇报祠。班本部下设总队部（大队部）；总队部直辖训练队，训练队按照学员多少而编。一般每训练队下辖3个区队，每区队约有学员130至200人。

训练内容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美方教授的课程在全教育时间中占到75%。在军事方面，主要是进行破坏技术训练，包括武器使用、爆破、投掷、防毒、劈刺、射击、演习、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如化装，就是通过装扮训练，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从事刺探或混入对方内部，用小型电台等方式向上级机关提供情报。政治训练则由教官、领队官佐分头进行。每天早晨副班主任讲话和晚间指导员训导，内容为如何效忠戴笠，如何效忠蒋介石，如何当好特务等。课堂上，着重教授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党派分析等。每次升旗与开训、结训所唱的班歌，系由德国法西斯的党歌改编而来，主要鼓吹：“智、仁、勇”。每星期一、六的早会和周会，向学员作“精神讲话”，宣称“攘外必先安内”、“戡乱救国”等，并宣扬美国的所谓强大和文明，灌输崇美思想。

每期学员毕业，都要举行典礼。事前，由政训组油印誓词，每人一份。典礼上，由副主任引导，学员跟着读，要其服从军统，不暴露身份，不泄漏秘密，“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事毕，收回誓词，与各人成绩册一道送重庆军统局及中美合作所存档。训练班学员结业，由队长带赴大操场，领受美制武器、弹药。所有部队结训后，均经美方以十人配备四支汤姆生冲锋枪，四支卡宾枪，四支手枪，每人两枚手榴弹，子弹按汤姆生每枝1500发、卡宾枪每枝1000发，手枪每枝200发的比例配发。

实际上，雄村班从创办至撤销，先后共办了9期¹，副主任由郭履洲担任，美方则派马斯德少校（J.H.Masters）为教导官。总计共调训忠义救国军及别动军第七纵队、军统局皖南行动队与福建调查室行动队等部队共15885人，而忠义救国军受训及装备人员共有约8000余人。在中美合作所里，雄村训练班举办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训练出来的人也最多。1945年秋，戴笠曾陪同梅乐斯前往视察，对这个班的训练成绩极表满意。

雄村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最少，最多的是第五、七期，各达1000余人。受训学员除由忠义救国军与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七纵队调派外，还有军统局皖南站行动队、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单位保送来的，也有军统局招募来的一部分学员。

第一期训练时间为8个月，至1943年11月结束。主要人员是从阮清源刚开办不到两个

¹ 又说共办7期刊，见张霏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初版，第377页。

月的干部训练班的原班人马调过来的，共约官佐 800 余名¹。举行开学典礼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还亲自前往讲话。这期结业的学生，基本都分配到忠义救国军各团队以准尉级任用。抗战胜利后抢先进入上海的特务部队，便是由这个训练班所训练出来的，当时军统称之为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基本部队。

1943 年 11 月²，第一纵队所属的 3 个团，每团中抽调 1 个建制营，由上校督察高应潮统一率领，开赴雄村训练班，参加第二期训练并装备美式武器。以后每隔 3 个月，就从各团或支队中分批抽调 1 个建制营的部队，送到该班受训。训练时间一般每期 2 至 3 个月，训练内容主要是学会使用各种美式武器。到结训时，每个受训官兵，由美国教官直接发给 1 件美式武器，基本上都是自动步枪、卡宾和汤姆生居多，另有少数左轮和火箭筒³。

从第四期起，美方选派何登上尉（J.R.Horton）、赫尔中尉（Milton A.Hull）、荷兰上士（W.Holland）等七人，会同军统方成员，分成三个督导团，赴各部队巡回督导，考核成绩。何登上尉的第一督导团担任了澄锡虞沿江的水上爆破工作，赫尔中尉的第二团，负责了破坏浙赣和钱江大桥铁路的工作，荷兰上士的第三团则负责上海沿海地区的侦察、行动、爆破及沿海摄影的工作。⁴

第八、第九两期主要训练阮清源的部队，第八期训练装备了淞沪区指挥部第一团的整个建制团，第九期训练淞沪区指挥部新招募成立的第三团、独二支队，教导总队 3 个单位的部分新招官兵 1500 多人。第九期官兵结业时，正值抗战胜利，因此最后没有颁发美式武器。戴笠最后来到雄村，亲自办理遣散和留用手续。其中 800 余精壮官兵编为中美所教导营，由文琪带往杭州劫收，编余的给资遣散，旧官佐限期到淳安办事处报到候命。8 月 22 日改编遣散后，雄村班即告结束。

忠义救国军所属部队除了集中在雄村训练之外，还有少数在别的训练班训练。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的中美合作所第八班，也曾对抽调的忠义救国军张为邦部约 2000 人进行训练。该班以由赵世瑞、郭履洲先后任副班主任，娄剑如为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共办四期，学员结业后配发美式武器，后改编为教导第九、十、十一及特务营四营，归入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部指挥⁵，主要负责在浙江东南配合美国登陆。设在福建建瓯的第七班内也有少量忠义救国军部队接受整训。

忠义救国军部队除了统一进入中美合作所开办的训练班训练，还有一部分被分散到其他训练班。在南平无线电训练班，就有一批忠救军的文职官佐前往调训，训练班的班长是由忠救军调来的老兵当正副班长⁶。

二、培训医务人员

中美特种合作技术所开办以后，为了改善别动军及忠义救国军的医疗卫生条件，中美所也自行培育医务人才，成立野战医院。

1943 年 12 月，由于军政部设于湖南省东安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第五分所设备搁置未用，戴笠便商请何应钦参谋总长，连同原有教官全部借用，以开办东安医务训练班，派陶一

¹ 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浙江文史集粹 第 1 辑 政治军事卷（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 356 页。一说 300 人，见（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 年 3 月初版，第 47 页。

² 又说 1944 年 1 月。

³ 翁养正：《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浙江文史集粹 第 1 辑 政治军事卷（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 356 页。

⁴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 年 3 月初版，第 47 页。

⁵ 参见徐远举等著：《军统局、保密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3 蒋记特工揭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第 62 页。

⁶ 陈方生：《军统南平无线电训练班亲历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 3 蒋记特工揭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第 118 页。

珊兼任副主任，并由美方调派布莱克上校（Arthur.P.Black）和李德勒医师（Francis L.Lederer）负责教授。

第一期向军统局所属单位及别动军、忠义救国军所属原有的医务人员，与息烽特训班的学生考选出 69 人，于 12 月 12 日开训，并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可容纳一百张病床的医疗中心。

次年 3 月，别动军司令部呈奉军政部核准，将司令部的医务所扩大为军医处，所属各纵队成立医务室。忠救军总指挥部各支队，则各增设一等军医佐一名和护士若干。4 月 7 日第一期结训，选派其中 51 人，并配备美方医务人员 23 人，一并分拨忠救军，设立野战医院，由汪春瑞为院长。

第二期仍选调医护人员 15 人，另向军统局东南班考选富有医药常识的学生 30 人，共 45 人，在 1944 年 5 月开始培训，至 8 月 1 日结业。美方也派药剂师配合编组为两个卫生队，分发忠义救国军工作¹。

不久，衡阳紧急，医务班西迁独山，训练停止。忠救军野战医院人员紧缺，戴笠曾商请军医署向江西医学专科学校征调毕业生 14 人，但因为交通不便，只有 8 人前往报到。

第三节 培训后的忠救军的抗战事例

梅乐斯曾经说过，中美合作所的十个忠义救国军大队所属的每一个单位的活动都有很微妙的故事，都可自成一个题目，分别写成许多书²。培训过的忠义救国军，本来是以奇袭为长，但在某些地区也集结了较多的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同时对日伪的交通等进行破坏。

1) 破坏钱塘江大桥。

为了接应美军在东南沿海的登陆，1944 年 10 月初，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接到戴笠的密令，挑选爆破队精干人员 15 名，由忠义救国军第二总队第六团副团长周荣率领，担负炸毁钱塘江大桥的任务。

钱塘江大桥是杭州通往浙东的要道，日军在浙东沿海的镇海、宁波、定海、象山、临海以及温州等地都置有重兵，一旦美国要从杭州湾登陆，则驻扎在浙东的日军必定循杭甬铁路通过钱塘江大桥北上驰援，使得登陆的美军腹背受敌。为阻止敌军增援，戴笠将炸毁大桥的使命交给了受训完毕、装备充足的忠义救国军。

要破坏大桥有相当的难度，一是日军对于这一交通要道看护严密，即使是晚上也是灯火通明，且有哨兵不断流动巡视，二是大桥桥基坚固，需要千磅以上的炸药才能炸毁，三是无快速机动汽艇运送炸药。对此，戴笠指示与忠义救国军同行的美国教官先行返回，而让周荣等人留下等待时机想方炸桥。

1945 年 2 月 4 日清晨，乘着江面大雪纷飞，周荣等人携 1200 磅分乘预备的小艇顺流向大桥进发，在第六、第七两桥墩下引爆炸药，轰然巨响中，桥基受到严重破坏。钱塘江大桥爆破成功，杭州至宁波铁路交通中断。

2) 连续破坏湘赣铁路。

日军发动长衡战役时，曾以驻浙江金华的第十三军向浙赣边境进攻，作出占领江西南部姿态，以为策应。日军第十三军的第七十师团于 1944 年 6 月 8 日向金华西进，26 日攻陷衢州，由于受到强烈抵抗，无力再进，27 日被迫退回金华。

军统为牵制这支日军，于是令忠义救国军加强对浙赣铁路沿线的破坏。9 月，忠义救国军挑选了一支 300 人的突袭队，前往浙江诸暨县附近破坏铁路，阻滞日军的补给运输，结果毁坏铁路 5 处，哨舍 2 所。

10 月，忠义救国军在诸暨附近发动一次突袭，成功炸毁 20 处铁轨及两座桥梁。11 月初，

¹（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 年 3 月初版，第 68 页。

² 转引自（台）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 1974 年，第 892 页。

忠义救国军再次组织一支名为“劫煞组”的破坏队，专门对浙赣铁路沿线日军仓库加以突袭破坏。结果在诸暨附近焚毁日军仓库，烧毁约十万加仑汽油和柴油、600箱弹药。

美国教官赫尔挑选反正伪军130名组成破坏队，使用延时爆炸的新型爆破器材，在诸暨附近安华村炸毁浙赣线火车和铁轨。

日军在受到一系列突击破坏后，发动了一次搜索战未果。又派出行动人员企图暗杀赫尔，结果3名被捕。期间，又遭忠救军突击队袭击，在开化损失了5座日军仓库，被烧去汽油20桶，菜油700桶，米9担。¹

3) 破坏浦阳江铁桥。

浦阳江铁桥是仅次于钱塘江大桥的重要桥梁。钱塘江大桥被炸后，日军防守更加严密，任何船只在不接受检查或规定的时间之外，决不能接近桥下，这项爆破任务又落到了忠义救国军浙东特种爆破组。

1945年5月5日，该爆破组利用黑夜，先由潜水人员乘小船到江边隐蔽处潜伏，再分批携带250磅炸药、50个及水雷等器材来到江边，密藏在船舱之内，划船到距200公尺处，由潜水人员把水雷炸药装置在第三桥墩下。午夜，引爆炸药，将三、四桥墩炸毁，五、六桥墩倾斜，桥面铁轨严重破坏，浙赣交通再次阻断。

4) 救助美国飞行员。

1943年5月，有6名美国飞行员同时被迫降落在崇明海滩，在严密的监视下，忠救军海上总队冒险抢救，再由海上护送至后方，该队因此受到美国司令级奖状²。

5) 方元铺的反突击战。

1945年入春以后，戴笠和梅乐斯为了策应美军的登陆作战，再次巡视东南沿海，5月下旬转到浙江于潜方元铺的忠救军前进指挥所，召集纵队以上人员举行军事会议。事为日军探知，纠集1700余人，以一少将级军官指挥，对指挥所驻地实施包围攻击。

戴笠当即命活动于桐庐附近的第三纵队连夜出发，向日军的侧背攻击。同时责成忠救军副总指挥王春晖指挥所部直属部队进行抵抗。在查明敌方指挥所位置后，又组成敢死队乘夜突击，一举摧毁其指挥所，并击毙其少将指挥官，又遭到第三纵队侧面攻击，损失惨重。³

6) 破坏宝城煤矿。

1945年6月6日，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会同中美合作建立的第三行动区，派出行动人员30人，化装成工人，混入苏南宝城煤矿，秘密安装定时炸弹，当晚9时引爆，炸毁该煤矿第一、第二两个矿井和开矿机、发电机，使该煤矿停产⁴。

7) 飞云江布雷歼敌。

日军自福州撤退后，由沿海地区在陆上向温州撤退，被国军李良荣部队紧追猛打；浙东乐清、白象的日军黎冈支队从北向南发动攻势接应北窜的日军。

南侵北窜的日军约6000人，于6月9日在平阳会师，共同北窜。当其先头部队离开平阳后，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指挥官郭履洲，根据日军行进的方向速度和时间距离，判断其将乘夜横渡飞云江。但江中船中有限，日军渡江需要较多时间，等待渡江的时候又一定会寻找较大的建筑物休息，于是他挑选善于游泳的爆破教官巫铭田率领队员十余人，背负爆破器材，在日落后潜渡过江，挑选一碾米厂和炼油厂分别埋设地雷和定时炸弹，并破坏渡河的船只，又迅速撤回北岸监视。

当夜，日军果然进入碾米厂和炼油厂休息，日军疲劳休息之余，突然遭遇地雷和炸弹，

¹ (台) 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年3月初版，第97—98页。

² (台) 良雄：《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4月再版，第394页。

³ (台) 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年3月初版，第130页。

⁴ (台) 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年3月初版，第119页。

损伤严重。¹

8) 于潜昌化的运动战。

日军在方元铺失利后,于8月初抽调苏州、常州和广德一带的日军,由伪军前导,从北面向忠救军的指挥中心和于潜昌化进袭,同时从杭州、富阳一线抽调兵力,沿江进袭桐庐,牵制忠救军第三纵队,逐渐形成合围的态势,两路日军共达万人以上。

当时为了保存实力并策应美军登陆,忠救军主力尽量避免与敌直接对抗,但也不轻易放弃现有基地,因此,马志超下令各纵队集结兵力,保持机动,运用地形和情报展开运动游击战,在运动中打击日军。当日军前锋接近忠救军总部时,总指挥马志超率领突击队对日军进行了突袭,日军前锋大乱溃逃。忠救军各纵队侧击呼应,所以日军虽然在形态上逐渐缩小了包围圈,但实际上并未收到效果。²

9) 河桥之战。

1945年8月12日,戴笠等人在昌化的河桥镇商讨作战问题,日军33旅所属部队2100余名由富阳方面北窜,行抵新登、分水两县交界处的麻车铺时,与忠救军第二、三纵队遭遇,发生战斗。纵队指挥鲍步超认为敌军行动可疑,除据情电报总指挥部外,并挥师跟踪北上。马志超接报后,加强了河桥的守卫,并电令二纵队派一加强团至河桥,准备迎敌。是日晚11时左右,日军果然袭击河桥。双方激战一日,共毙敌4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枝。

第五节 小结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军统局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又对本部组织进行了扩大,共分为三区、七室、一委员会,全部工作人员1500余人。八处中,第一处就是军事处,主管搜集军事情报和扩大军统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以及别动军指挥部都受其控制,由此可见戴笠对忠义救国军地位的重视。

忠义救国军被戴笠视为军事上的基础与政治上的资本,在中美合作的洽谈过程中,它作为敌后游击部队,因其重要地位与作用为戴笠争取与美国合作创造了条件,促成了戴笠和美国情报部门的合作。戴笠经过蒋介石核准,与美国海军部门合作,由美方负责训练中国的游击武力,使其掌握情报、破坏等技能,并为其配备美式武器,并协助中国建成气象站、电台和侦测;而中国方面,除了供给人员,还需要负责运输以及基本设施,甚至军统局已经建立的情报设施。虽然最后因为战争的迅速结束,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并未登陆,但戴笠因此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为其“胜利”接收打下了基础。

在合作过程中,梅乐斯另向戴笠许诺,在战后辅助中国建设一支新海军,并首先从忠义救国军、别动军部队中挑选精干分子训练为海军陆战队员,同时还示意戴笠多多物色海军人才³。由此,戴笠的野心更大了,企图深入到海军中去控制战后建立“新海军”的大权。

此次中美合作,实际上成为军统自我扩张势力的捷径,军统也成为收益最多的部门。但是在这次中美合作中,美国更多出于获取中方气象、日方无线电密码成果侦译等重大更新资料的需要,为进攻日本做好准备;为中国建设海军、甚至警察和建设通讯设备,在长远看,也是为了和苏联陆军相持作长远的准备⁴。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美合作是以中方牺牲某些国家机密为条件的。而戴笠与美国海军合作的成功,提高了戴笠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由此也激发了戴笠更大的野心。

¹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年3月初版,第122—123页。

²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年3月初版,第130—131页。

³ 徐远举等著:《军统局、保密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3 蒋记特工揭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⁴ 潘嘉钊等编:《戴笠 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第五章 戴笠与抗战结束前后的忠救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随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却逐步与民心背道而驰。而作为国民党敌后抗战的游击部队之一，忠义救国军也忠实贯彻了国民政府的反共方针，在受降和接收各大中城市的活动中充当了急先锋。

第一节 抗战胜利前后的局势

一、反共成为主导

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壮大，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至1945年4月，由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了9550万人口，形成了19个大的解放区；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已经发展到了91万人，不脱产的民兵发展到220万人口以上，所辖区域广大，人口众多，由于执行抗日民族政策，政治蓬勃向上，在全国影响巨大，形成了民之所归的趋势。

抗战即将胜利，这使得因战乱而疲惫痛苦不堪的人们看到了和平、安定的曙光，向往和平追求民主建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为了维护其一党独裁，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动员全部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抢夺胜利果实作为中心议题之一。18日的大会上，蒋介石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当时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都偏处西南，日本投降后，大军在短期内集合开赴沦陷区受降无法实现。而沦陷区内，尚有拥有各种轻重武器的投降日军130多万，近百万的伪军力量也不可忽视，如何顺利完成接收以及防制中共就成为当时蒋介石及其政府最头等的大事。

二、戴笠的接收准备

戴笠“反共”的意识此时也占到了上风，他认定沪宁地区是蒋政权的心腹地，也是自己政治上的命根子，他冷静地认为：“抗战并未真的已经胜利，因为对付共产党比打日军更困难十倍百倍，所以不能说是已经胜利。就所负责任来说，只能说旧的告一段落，新的更困难，刚刚才开始。”¹在这种态度下，戴笠为顺利接收做了大量准备。

在政治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垄断在中国战区的受降权，甚至不惜与日本战犯相勾结。而戴笠则忠实地执行了上述旨意。他利用手下刘方雄和冈村宁次的同学关系，命刘方雄前往南京，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交涉接收和反共事宜。戴命刘向今井武夫转达为防止共产党接收京沪杭地区，“能将京沪杭地区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收”，“不但他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政府必将优予厚遇，不使他稍受委屈。”并强调说：“此事关系极为重要，我大军远离京沪，而陈毅、刘伯承两部重兵，则密迹京沪。倘冈村不计及战犯后果，不负责任，则共匪欲谋京沪，如探囊取物，只有利用你和今井的关系，才能使冈村对代表我讲的话，深信不疑”²。25日刘方雄在南京面见冈村宁次，转达了戴笠的意见，冈村听罢对可以不把他当战犯的优待十分意外，一时竟不敢相信，但随即表示“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³。他命令日军协助国民党进行反共作战，大量的日军残留部队被中共军队消灭在解放战争中，而在同时，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一大批双手沾满中

¹（台）张需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初版，第438页。

²（台）乔家才：《胜利前后的奇事奇闻》，载（台）《中外杂志》第28卷第4期。

³【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

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却因此逃脱了战争审判，甚至成为了蒋介石的座上客。

在军事上，为防止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确保京沪地区治安，戴笠向蒋介石力保当时掌握京沪地区实权的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长，以周佛海税警团的武力为主体，负责维护京沪地区的治安，在其他正规军不能及时到达接收的地区，赋予在当地的伪军以番号，责成其维护当地治安及阻挡共产党武装。同时，任命杜月笙的大徒弟陆京士为工人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并以京沪特派员的身份赶赴上海，力图重新插手控制上海的工人运动，并协助抢救财产。

接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之后，戴笠急调邓葆光、尚望等人去上海接收并改编伪军；为了防止顾祝同的三战区插手京沪，他向蒋介石力荐将其密友汤恩伯的部队从贵州空运至上海成立三方面军，负责上海接收。他还向蒋介石要求，指定军统负责处理全国各地的汉奸工作，希望利用蒋的手令撇开警察法院，抢夺逮捕、审判汉奸的权力，夺取汉奸财产，又达到包庇大批汉奸的目的¹。

三、忠救军的接收任务

早在1944年11月，戴笠调阮清源接替于陶生担任上海专员时，答应阮暂时以专员名称掩护，将来即是忠义救国军淞沪挺进纵队指挥。在那时，戴笠就已经明确了忠义救国军的去向，他说：“忠救军之责任，在于光复上海与南京时，必先进入京沪；否则忠救军无前途，军统局亦必失色而受累”。²由此，忠救军在抗战后期的任务也比较明显了。

为避免共产党新四军部队首先抢占南京、上海及杭州等重要城市，8月10日，戴笠电“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赶赴淳安，与梅乐斯等谋定保卫三大城市的策略，并呈获军委会核准。该计划主要内容为下³：

1. 派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官郭履洲，率领所部及上海行动总队，和中美所第八班的第三个教导营集中浙江的海门，从海道北上浦东，进驻崇明，扼守上海前门，防堵苏北渡江南下的共军。
2. 派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率领所部，由太湖沿岸挺进吴淞一带郊区，防堵共军向上海郊区的渗入，以固上海之侧背。
3. 派军统局京沪行动总队，并配忠义救国军之一部，挺进至南京近郊，监视中共之活动，并维护京沪铁路交通，防止共军破坏。
4. 派忠义救国军鄞杭区指挥官鲍步超，率部推进至杭州近郊设防。
5. 派“中美所”第七班副主任林超，率该班各教导营，经淳安推进至沪杭线，相机支援上海。
6. 派忠义救国军第一和第二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长官部的命令，防守天目山区，监视浙西残留共军活动，并相机支援杭州。
7. 派以娄剑如为指挥官的“中美所”第一班教导营编成的“中美所”直属第一支队，由李崇诗率领，挺进富阳与杭州之间的郊区。
8. 派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向富阳和杭州挺进，作为中美所直属第一支队的后继兵力。
9. 派杭州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杭州铁路交通，防止共军破坏。

8月23日，戴笠又电忠救军全体将士，重申部队立场及组织纪律性：“诸同志应各就工作岗位，协应友军，爱护民众，共维地方之治安，严防奸匪之进袭。凡伪军部队，能服从中

¹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局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摘自《特工密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50页。

² 古僧编著：《戴笠将军与抗日战争》，台北华新出版社1976年初版，第268页，转引自洪小夏：《关于上海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601

³ （台）张霭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初版，第453—455页。

央命令，坚决抗拒奸匪者，本局均可查明其实力，呈准中央，给予相当名义，联络一气，团结一致；监视敌军行动，制止奸匪之活动，决不可以弱肉强食，循环报应，形成对立，自乱步骤也。万一因给养不继，必需向地方暂行筹备者，亦必商同地方士绅，按实际最低限度之需要，暂行借贷，决不准胁迫勒索；如有故违，一经查明或有民众告发，必定严惩不怠。”¹然而，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样的电令只是做了表面文章，在实际接收过程中，一些部队恣顾纪律，大肆劫收，连戴笠都始料不及。

第二节 接收和“劫收”

在抗战结束之前几周，国共双方在东南城市附近和沿海地区的斗争就已经日趋激烈，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指挥下向京沪杭地区移动，也随时准备接收各大中城市。

1) 克复温州

日军撤出福州后，由沿海地带向温州撤退，6月16日抵达温州，温台指挥部指挥官郭履洲调第九、十、十一三个教导营部署在永嘉西南地区，准备分三路进攻温州，17日午夜三路同时进攻。18日拂晓光复温州。²

留守温州的其中一部残敌撤退时，由水路顺流向江口的铜头撤退。当时铜头的伪军大队长陈荣傅已被秘密收编为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部水上大队长，6月20日日军抵达铜头弃船登岸时，见伪军来迎，毫无戒备，被陈部痛击，当场被击毙百余人，其余30余人被俘，无一幸免。³

1945年7月上旬，忠义救国军温台地区指挥官郭履洲命令教导总队第10、11营由浙南沿温、台北上，准备从三门分兵二路向宁海县城进发，形成东西夹击，一举歼灭日军解放宁海。但日军得到汉奸情报，知道他们的进军路线，已在要地埋伏布防。7月8日，敌我在溪桥处冲突，教导总队官兵奋不顾身，与日军激战了二个小时，双方均有伤亡，日军退到白岙岭西端，继续顽抗。日本投降后，日军退出宁海。为表彰和悼念在此次宁海战斗中牺牲的抗日将士，1946年1月，经县政府会议通过，在跃龙山建一座忠义救国军阵亡将士墓园。9月落成，并公祭阵亡将士，为当时之一大盛事。该碑正面镌刻国民党党徽及“忠义救国军抗战阵亡将士墓碑”13个大字，左右两面刻载阵亡官兵姓名、军衔、年龄、籍贯，碑阴镌刻建造缘由、捐助者姓名及时间等。建国后，该墓园继续存在，供游人瞻仰膜拜，仅凿去了碑上国民党党徽及碑名。直到“文革”期间，此墓园才被毁除。⁴

2) 克复永嘉

1945年6月16日，日军独立62旅残部及黎冈支队主力，抵达永嘉，随即渡瓯江继续北窜。但以黎冈支队所属的一个大队，留守在永嘉以迟滞我追击部队之行动，郭墨涛副总指挥事先买通其留守部队的翻译，将定时炸弹埋设在中山公园附近日军在大队部内。同时命教导第九营营长陶凤威，教导第十营营长吴公达，教导第十一营营长洪竹筠，率各部兵力，由西南方向分三路进攻永嘉，以定时炸弹爆发为信号同时猛攻，日军仓惶由东门溃退，狼狽渡江，永嘉城遂告克复。18日凌晨又清扫战场，渡江追市，至白象镇、柳市两地，日军疲惫不堪，仓惶将由福州撤出的轻重步炮弹药丢弃逃跑，均为我所获⁵。

3) 克复海门

追击部队来到椒江南岸，日军获得掩护，于是稍作停顿喘息，郭墨涛判断日军必将继续北窜，此时正是调整部署的良机，于是命令独立第一支队长崔杰速往舟山率领第一、第二大

¹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年3月初版，第143—144页。

² (台)张芾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第407页。

³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年3月初版，第123页。

⁴ 胡开法：《抗日战争之宁海黄坛古镇失陷始末》，转自血铸中华网站。

⁵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90—91页。

队（第一大队长陶志山，第二大队长李谦益原均为舟山的伪军经温台指挥部收编为独立第一支队所属的第一、第二大队）潜至椒江北岸，准备袭击渡江北甯的日军，同时令追击部队待敌渡江之际，乘机进攻海门。日军渡江之际，突然遭到北岸袭击，事出意外，伤亡惨重，同时海门也被克复¹。

4) “劫收”沪杭

1945年6月间，阮清源率领指挥部人员和第一团特务大队进入沦陷区后，在沦陷区策反了一个伪军团，收编了一些游杂武装，约两个团的兵力。日军投降后，京沪杭地区已经责成当地伪军维持治安，但是中共部队在吴兴和余杭一带有2万余人的兵力，其中一部已经开往崇明和川沙。为赶在中共部队之前接收这些城市，戴笠命令位于浙东曹娥江地区的阮清源纵队3日内赶到上海，位于浙东台州地区的郭履洲纵队于5日内赶到上海。

阮清源接到命令后，立即在部队召开组、科长和部队长紧急会议，传达了戴笠令指挥部限期到达的电令，并令部队立即行动，指挥部、特务大队和第一团先走，其余部队随后。当时部队吃穿用度都非常困难，士兵没有帽子，只有一套用当地土布染色的军装，士兵们带上破棉被破草鞋，包括连队里的行军锅等炊事用具一起行军，毫无军容可言，因此阮部又被称为“叫化子部队”。忠救军京沪行动队在8月21日抢先进驻镇江和无锡，之后又进入上海，如饿虎入市，在接收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切财产之后，又将当地的工厂、洋楼、银行、医院等全盘接收，以致于上海人惊呼“强盗还来了”²。

军统特务武装的“劫收”引起了其他国民党大员的不满。30日，冷欣报告何应钦的电文中说：“南京秩序，已渐安定；惟仍大多数机构（特工分子）自立名义，强收房屋及机关，已设法查禁。”9月1日，芷江总部电示：“据戴笠电称：‘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系去年12月，业经委座（笔者按：蒋介石）核准其所部八千人开抵上海近郊大漕河，已转饬静待本部命令，方能开入市内；又据报各方面在沪人员，多有轨外行动，请转电严令制止。’”等语。查该忠义救国军非指定之受降部队，应转饬不可进入上海区；并对我各方面工作人员严令约束，特电遵照。冷欣将电文转饬驻沪代表公署蒋伯诚，同时另电军委调查统计局戴笠：“近以日寇投降，我国军大部尚未开入陷区之前……抑且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妄缴枪械，绑架勒索，无所不为！以致京沪一带城市，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舆论沸腾，闾里骚然！若不迅予遏制，后患殊堪忧虑。兹拟恳请我兄遴派能以统率多方面之人员，克日前来镇慑，借资维持地方秩序……”

这些电文充分显示，虽然抗战胜利，但是各地治安即又陷入一片混乱。戴笠为尽快抢夺胜利果实，竟不惜与其他国民党大员冲突，四处搜刮财产，在这当中，忠义救国军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第三节 忠救军的最终改编

早在1945年6月9日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海军金氏上将曾向中国提出建议，希望在中美合作所结束之后成立新的合作业务和合作机构，协助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海军，并命令梅乐斯积极进行。同月18日，梅乐斯即向蒋介石提出具体意见，请致函杜鲁门总统，先派代表团来华调查实际情况，然后具体策划建立军港和海军学校，增加海军设备，增调船舰来华，建立陆战队，以及兼顾民用海运和商船事业等。梅乐斯表示，中美合作所训练的部队，将来可改编为海军陆战队。当时这项建议，被蒋介石所认可，8月27日，由宋子文向美国海军部部长佛雷斯特尔和金氏上将商请派考察团来华。³

¹（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91页。

² 颜公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劫收”风潮》，《文史月刊》2007年第3期。

³（台）张霭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初版，第423页。

1945年10月3日,中美合作所根据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决议的原则,从事中美合作所的结束事宜。11月,戴笠派毛人凤、潘其武与贝乐利、鲍民在重庆曾家岩招待所进行了细致的商讨,决定对于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的处理原则,拟俟新的美国驻华海军顾问团来华后,洽商改编其为中国海军陆战队或海军巡防队¹。

然而,代表海军部门利益的梅乐斯从最初与戴笠合作开始,就面临着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其他军种尤其是与陆军之间的深刻矛盾。美方如果要充分展开与戴笠的关系,就不得不首先理顺梅乐斯与战略情报局的关系。1943年11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邓诺文将军接到关于海军活动的报告之后,提出希望由战略情报部门的一个正规的分支机构来代替海军代表团,海军部门则竭力反对这种强迫其部队撤离中国的企图。²12月2日,邓诺文抵达重庆,与戴笠晤谈,商讨战略局与军统局有关战略性质的情报搜集、研究分析、心理战争等工作,并要求梅乐斯和戴笠都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统辖。当戴笠和梅乐斯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邓诺文甚至解除了梅乐斯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到1945年抗战胜利,美国陆军和中美合作所的关系还是没有出现任何转机。

1946年3月,美国海军助华法案向国会提出,参众两院海军委员会决议对协助中国的海军将仅限于护航舰,驱逐舰等小型舰艇。为继续合作,双方仍在不断的接洽商谈。最后,中美以新的形象继续合作的计划最终因为戴笠飞机的失事而宣告终结。

而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各教导营、行动队,及军统局所属的军委会交通巡察部队,一起改编为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一个直属大队。1946年3月1日,成立交通警察总局,由吉章简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任副局长,隶属于交通部,统一整训管理指挥铁路警察及各地交通警察总队,担任全国铁路公路航路治安的维护,以及矿区的警卫工作。这批特务武装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实际上仍然受到戴笠及军统局的控制。

当时忠义救国军总计18037人,分别编为交通警察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八等五个总队,直属于交通警察总局之下,总队队长分别是李让、王春晖、姜建中、鲍步超和郭履洲。其余大队由交通巡查部队及别动军和中美合作所各训练班教导营改编而成。

交通警察总队第十一至十四各队编制,均与国军步兵团相同,即每个总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大队,另设一个平射步炮队,一个破击炮队,一个通信队、一个特务队;各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及一个重机枪队;合计官兵2740人。

第十八总队辖2各步兵大队,一个舰艇大队,一个装甲大队,另有特务队、通讯队、卫生队各一,专任京沪区铁路公路及长江与运河巡护工作,合计官兵3000余人。

这几个总队整编完成后,就地予以训练。唯阮清源因为经济问题被戴笠关押,淞沪区指挥部所属各团队10月归并起来编成一个加强团,以伍道远为该团少将团长,李凤为上校副团长,由汤恩伯接收,改编为第三方面军直属炮兵团,其余官兵都另找门路,没有改编为交警总队。

¹ (台)张霭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初版,第421页。

²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5—237页。

第六章 结 语

忠义救国军是国民党军统组织控制下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它的成立和发展蕴含着戴笠的个人意志，从一开始就背负着蒋介石政权抗日及反共的沉重使命。这也是它得以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节 抗战八年

如今，对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淞沪会战时期的表现，大多数学者都表现出了肯定以及宽容，在本人的《忠义救国军起源略论》中，也参考前人著作较为详细地罗列了其战绩。但在忠义救国军正式挂牌成立之后，大家就有所侧重地关注其反共的一面。为此，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和档案时，整理了一份忠义救国军抗日活动简表，将忠救军对敌伪制裁、破坏和突袭情况暂列如下：

忠义救国军抗日活动简表

年份	对敌伪制裁		破坏次数	突袭次数
	次数	死伤数		
1938	19	20	7	3
1939	27	41	20	1
1940	62	68	2	1
1941	94	109	33	11
1942	14	14	9	20
1943	4	4	41	10
1944	4	5 ¹	39	11
1945	1	2	23	66
总计	225	263	174	123

注：此表由“忠义救国军历年来对敌伪制裁工作一览表”、“忠义救国军历年来对敌伪破坏工作一览表”、“忠义救国军历年对敌伪突袭工作一览表”¹三表制成。

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也有部分战斗报表²，内容详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从该表可以看出，忠义救国军在抗战八年中，不间断地在上海、苏州、南京、杭州附近地区对日伪进行了制裁和突袭、对基础设施进行了破坏。

结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档案我们可以也看到，忠义救国军 1940 年前的活动主要侧重于小规模游击战，形式灵活多样。或对个别日伪进行制裁，杀鸡儆猴；或对盘踞在各据点的小队日伪发动突袭，干扰其正常运作；或在日伪占领的工厂发动群众进行破坏；或在日伪占据的城市张贴抗敌除奸的海报等，对日伪实施心理战术。

1941 年尤其在忠救军进入中美合作所培训后，因为其加强了武器装备，有能力对日伪军队突袭以及进行破坏，因而其针对个别敌伪的制裁活动减少，而破坏和突袭活动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对日伪的影响范围扩大。如：破坏钱塘江大桥、浦阳江大桥等。在部分活动中，忠救军直接配合了正规军的作战，阻断了敌军的交通，牵制了他们的兵力，在战争中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忠救军对抗日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这一点应当予以肯定。不过，由于忠救军成分复杂，所处的环境恶劣，因此在抗日活动的同时，不乏一些地方武装投降日伪，日本方面也因此对忠救军抱有希望，认为忠救军是在农村的“现存的自卫队”，无强烈的反抗意识，可以进行

¹ 含一人被捕。

² （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70 年 4 月出版，第 97—146 页。

³ 《忠义救国军最近各战役设备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9199；《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各战役汇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11999；等。

收买¹。然而，应当明确的是，忠救军的骨干基本都是戴笠的手下，对待同日本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十分谨慎的；但是部分被忠救军收编的散兵游勇出于生存等种种现实问题的考虑，同日伪关系十分暧昧，甚至直接投伪，这就需要加以区分，此文不再涉及。

第二节 总体评价

从忠义救国军个案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国民党在抗战后对发展敌后武装力量的态度和方针，兼及对戴笠及其军统武装在抗战期间历史活动研究的完善。忠义救国军是军统武装部队中历史最久的一支部队，它的出现主要是源自戴笠“抗日”与“建军”的双重考虑，是戴笠向军界发展势力的一次成功尝试。而忠义救国军也给戴笠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无形的政治资本，使得戴笠从暗杀、绑架及幕后的情报活动转向正式拥有武装力量，进行军事活动；与美情报部门的合作更使得戴笠的事业达于顶峰。从这方面来看，忠义救国军为戴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平台，使其跻身更高行列有了可能。

然而，戴笠的政治生命是依附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其政治目标和手段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是统一的，因此，对于戴笠和军统组织及其武装部队在抗日战场的表现既不能全面否定，也不能矫枉过正给予全盘肯定，而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忠义救国军的历史评价也应立足于此。

从服务于抗战大局的角度来看，忠义救国军是军统组织开展敌后情报与行动工作的主要游击武装部队，是国民党组织在沦陷区能够保存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它在敌后牵制了部分的日军，在破袭、暗杀等方面给日军以实质性的打击，扰乱了他们的作战步骤；美方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它也曾为此作出准备保障顺利登陆；此外，忠救军对伪军也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打击和拉拢，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敌对范围，这些活动我们都应予以适当肯定。

另一方面，自1939年皖南事变以后，忠义救国军在苏浙皖地区不断与中共部队摩擦，因此一直以来为人所诟病。另外，该军纪律不甚严明，帮会气息浓重，人员流动性大，与日伪军关系暧昧，直接导致了忠救军在世人心目中汉奸加土匪的丑陋形象。到抗战胜利初期，忠救军更变为接收日伪财产、收编伪军的重要的维护部队；最后，编入交警总队，成为反共内战的工具，其消极一面也无法抹煞。

历史证明，事情总有它的两面性。在戴笠的权势更多的扩张到财经、交通、安全、检查等多方面时，蒋介石对他也愈加猜忌，并显示了要整治其尾大不掉的倾向。当戴笠和军统与蒋介石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戴笠的座机失事撞向了南京江宁岱山，那一刻错综纠结的线头突然全部打开，蒋戴矛盾一下彻底消除。也许历史自行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而忠义救国军也随着被编入交警总队而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¹ 【日】池田诚：《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求实出版社1989年5月，第167～168页。

主要参考文献

一、未刊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未刊档案

1. 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全宗号 787；
2. 军政部档案：全宗号 773
3.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国防部保密局档案：全宗号 765
4. 陆军各部队档案汇集：全宗号 804

二、各地文史资料：

1. 《歙县文史资料》第 1 辑，歙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 年
2. 政协广德文史委员会编印：《广德文史资料》第 1、2 辑
3. 宁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国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7 年
4. 《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革命史料选辑》第 7 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54 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2、58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1988 年
9.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1985 年编印：《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
10. 江苏省宜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宜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1. 江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1985 年编印：《江阴文史资料》第 6 辑
12. 江苏省吴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 年编印：《吴县文史资料》第 7 辑
13. 政协吴江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 年编印：《吴江文史资料》第 15 辑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95 年编印：《无锡文史资料》第 31 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专辑》
15. 六合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 年编印：《六合文史资料》第 1、2、3 辑
16.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 1995 年编印：《腥风血雨一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江苏文史资料》第 80 辑）
17.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党史资料与研究》2005 年第 3 辑
18. 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 年编：《湖北文史资料》总第 23 辑《张执一自述》

三、各地回忆录及论著：

1. 文强：《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2. 胡训珉、贺建：《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3. 陈楚君 俞兴茂：《特工秘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2001 年
4. 沈醉：《沈醉日记》，群众出版社 1991 年
5.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年

6. 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7. 黄康永口述 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
8. 沈美娟：《风流特使唐生明》，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9.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
1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蒋记特工揭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
12.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 5 卷 20—5，八年抗战 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
13. 扬帆：《扬帆自述》，群众出版社 1989 年
14. 恽逸群：《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5. 刘才赋：《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6.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
18. 潘嘉钊等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 1993 年
19. 茅家琦等著：《中国国民党史》，鹭江出版社 2005 年
20. 章君谷：《杜月笙传》，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8 月 30 日再版（四册）
21. 张霁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 1999 年初版
22. 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 年出版
23. 国防部情报局编印：《中美合作所志》，台北，1970 年 3 月初版
24. 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战》，中外杂志社 1981 年 10 月再版
25. 徐恩曾等：《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出版社 1992 年
26. 《戴笠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编印 1985 年
27. 文强：《文强将军回忆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0 年 1 月第 1 版
28. 《国特头子——戴笠》，中原出版社 1985 年 9 月初版
29. 良雄：《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4 月再版
30. 申元：《戴笠轶事》，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3 年出版发行
31.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初版
32. 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综合月刊社 1974 年
33. 【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 1981 年
34. 【日】池田诚编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求实出版社 1989 年
35. 【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 2004 年
36.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7 月

四、论文：

1. 黄寿东、苏智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初探》，《档案与史学》1997 年 3 月
2. 何署：《“孤岛”时期的军统局策反委员会》，《文史精华》2001 年 12 期
3. 孟国祥：《不忠不义的忠义救国军》，《民国春秋》1999 年第 4 期

4. 何蜀：《抗战初期的忠义救国军》，《文史精华》2000年第6期
5. 毛德传：《忠义救国军始末》，《军事历史》2002年第2期
6. 毛德传：《忠义救国军及其最后的覆灭》，《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7期
7. 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8. 洪小夏：《关于上海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9. 颜公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劫收”风潮》，《文史月刊》2007年第3期
10. 洪小夏：《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合作所论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附：

忠义救国军大事年表兼序列

1937 年 9 月 · 上海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忠义救国军前身)

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 书记长：戴笠

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

委员：杜月笙、戴笠、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
钱新之、吉章简、蔡劲军、刘志陆、宋子文、
俞作柏、张治中、张啸林、杨虎
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

会内设机要组（潘其武）、总务组（王兆槐）、侦谍组（周伟龙）、军事组（俞作柏）、技
术组（余乐醒）、调查组（文强—人事科长）、交通通信组（张冠夫）、宣传组（陈旭东）

动员部前方办事处主任（处长） 文强

别动队总指挥部总指挥 刘志陆

别动队总指挥部总参谋长 杨仲华

第一支队支队长 何行建

第二支队支队长 陆京士

第三支队支队长 朱学范

第四支队支队长 张业

第五支队支队长 陶一珊

特务大队大队长 赵理君

北方支队 王天木

1938 年 4 月 · 祁门历口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

第一支队（教导一团） 俞作柏

第二支队（教导二团） 何行键

第三支队 李志明

第四支队 于陶生

第五支队 阮清源

第六支队 杨行方

第十支队 周振刚

南京行动总队 管容德

直属大队

北方支队

1940 年 3 月 · 孝丰、宜兴（1939）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直属第一大队	
	直属第二大队	
	第一支队	11 月 11 日由宜兴转往江阴，参加战斗序列。

戴笠与忠义救国军

军委会 苏浙行动委员会 忠义救国军 指挥： 戴笠 俞作柏 副总指挥： 俞作柏、 杨蔚 参谋长： 徐光英、 尚望 政训部主任： 曹勤余、 文强	第二支队	7月11日参加战斗序列。		
	淞沪 指挥 部（1939. 3.1） 指挥官由副 总指挥杨蔚 兼任，副总指 挥何行键，参 谋长徐志道， 军需处长刘 弋斯，副官处 长葛谷光，政 治部主任文 强，特务大队 ¹ 张大同，军事 特派员杨卓 夫，交通处 处长周迅予。	第一纵队 指挥 何行键 ² （4月 1日） 马柏生 （1940年1月20日）	第三支队	
		第二纵队 指挥 阮清源（6月10 日）	第四支队	
			第八支队	李启蒙（1940年1月 16日）
			第五支队	收编朱松寿部（39年8 月1日）
		第三纵队	第六支队	郭墨涛
			第十支队	
		第四纵队	徐志道（7月1日兼）； 郭履洲（11月13日）	
		东路先遣支队	徐志道（12月1日）	
		独立第一支队	胡肇汉（12月7日）	
		独立第二支队	张为邦（6月1日）	
		独立第三支队	顾继明（12月9日）	
		第七支队	姚友莲（12月4日）	
		第十五支队	程万军、范敏（1940年1月16日）	
		第十六支队	翁汤铭（1940年1月16日）	
		第十八支队	傅中昌（1940年1月16日）	
		第十九支队	赵北（8月16日）	
		第二十支队	顾子清，浒浦伪军吴文信部	
		第二十一支队	黄贞白，无锡伪军樊忠义部	
		第二十二支队	顾炳南（8月14日）	
		第二十三支队	徐秉德（12月9日）	
		执法大队	阎增（12月9日）	
	南京行动 总队 指挥 管容德 副指挥 贾维禄	南京行动一支队	王炳珊（7月15日），9月30日改为战地 工作团，团长郑子良，至1940年1月25 日取消。	
		南京行动二支队	王锡三，辖三个大队	
		南京行动三支队	许恒臣，辖三个大队	
		南京行动四支队	稽兴才，辖二个大	
		南京行动五支队	叶善金，辖三个大队	
			袁灿，辖三个大队	

注：1、第九支队陈荫祖曾投敌，后又反正至青浦县之练塘驻防，参见《忠义救国军程万军部投敌伪等情报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三00九（1）-174。

2、淞沪指挥部于1939年5月30日由沪迁至江阴，另在上海成立办事处，至1940年2月22日撤销，另成立京沪线政治特派员办事处，刘人奎为主任，办理淞沪指挥部结束事宜。

¹ 特务大队于5月30日撤销。

² 11月1日，淞沪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一纵队指挥何行键通电附汪，11月13日由丁锡三代理第一纵队指挥。

1940年3月—1941年1月·孝丰、广德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遵照金华会议实施缩编整训的内容，以淞沪指挥部与第一、二、五、六、十等支队暨南京行动总队为基础，将全军缩编。总指挥部人事组织除总指挥俞作柏于1940年1月调军委会中将参议，由周伟龙接任总指挥；军需处长周家礼于1940年秋交江传典（1943年由刘弋斯接替）外余无异动。

3月，所有新编部队，除南京行动总队，仍留驻江浦，就地整训，并与敌伪继续战斗外，其余一律集中孝丰，积极整训，总指挥部由宜兴移回孝丰，以便就近督导。编余部队，全部交由三战区顾祝同，分别派员接受整编，同时，淞沪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第四纵队，及原有各支队，大队号一律撤销。

教导第一团¹团长 王春晖、郭墨涛

教导第二团团长 罗国熙

教导第三团团长 阮清源

教导第四团团长 文德

南京行动总队 总队长 徐禧

淞沪行动总队 总队长 盛瑜

特务大队 大队长 程鼎光

军官训练队 参谋长负责

1941年12月·孝丰、广德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周伟龙

1、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 指挥 阮清源（兼）

以第三支队、淞沪行动总队、教导第一总队等三单位编成，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嘉兴与上海之间的地区挺进

2、第二路澄锡虞区挺进纵队 指挥 郭墨涛（1941年9月由汪浩然接替）

以第一支队、澄锡虞别动总队等单位编成，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昆山之间的地区挺进

3、第三路锡武宜区挺进纵队 指挥 文德

以第二支队、教导第二总队等单位编成，由广德沿太湖西岸，向宜兴、无锡、苏州、江阴之间的地区挺进

4、第四路京丹溧区挺进纵队 指挥 管容德

以南京行动总队为单位编成，进出于南京、江浦、丹阳等地

1942年2月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总指挥部 总指挥 周伟龙

¹ 又称支队

阮清源（1942年6月代理总指挥职务—1943年7月，7月调训离职，参谋长郭墨涛代行总指挥职，10月马志超到职后郭升为副总指挥）

副总指挥 阮清源（1942年4月由苏嘉沪挺进纵队指挥调回总部升任）

王春晖（1944）

郭墨涛（1943年10月）

参谋长 易德钧（1942年3月离职）

石树勋（1942年3月—8月离职）、

1943年春·宁国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总指挥部 总指挥： 马志超 副总指挥： 阮清源、 郭墨涛 参谋长： 叶天荫、 郭履洲	（所属幕僚单位）	参谋处	刘紫剑
		副官处	李风
		军需处	江传典
		军械处	程志一
		军法处	钱兆锟
		军医处	汪春瑞
		秘书室	葛维善
		野战医院	马志超
		特务营	程鼎光
		搜索营	郭彬
		军官队	李文俊
		通讯总台	曹国斌
	第一纵队 指挥 李让	第一团	安我华
		第二团	薛涤愁
		第三团	艾庆章、余钺
	第二纵队 指挥 汪浩然、 余万选	第四团	邹用元、文焕卿
		第五团	黄龙、亢祖周、陈杰生
		第六团	黄天存、姜建中、贾维禄
	第三纵队 指挥 鲍步超	第一支队	贾维禄、周荣
		第二支队	徐箴楚、朱炳奎
		第三支队	张光、任献廷
	第四纵队	因伤亡惨重，第四纵队番号撤销，并入第三纵队。	
	（直属部队）	南京行动总队	管容德
		澄锡虞行动总队	包汉生
		淞沪行动总队	顾伟
		浙东行动总队	相强伟
		浦东行动总队	张为邦

补：政训室少将主任 刘芳雄（1943—1945）¹

太湖行动总队 总队长 殷丹田、赵安民（1944）

马丁行动总队 总队长 马柏生，副总队长丁锡三（1944年6月）

¹ 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5页

戴笠与忠义救国军

总部部分非战斗机构及人员自王岭移宁国万家桥，总指挥部仍率军之主力，一面守备广孝地区，一面整训部队。

1945 年 1 月·浙江昌化、余杭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

总 指 挥 部	第一纵队 指挥 李让	第一团	安我华
		第二团	薛涤愁
		第三团	艾庆章、余钺
	第二纵队 指挥 汪浩然、 余万选	第四团	邹用元、文焕卿
		第五团	黄龙、亢相周、陈杰生
		第六团	黄天存、姜建中、贾维禄
	南京行动总队	管容德	
	澄锡虞行动总队	包汉生	
	淞沪行动总队	顾伟	
	浙东行动总队	相强伟	
	浦东行动总队	张为邦	
	特务营	程鼎光	
	搜索营	郭彬	
	军官队	李文俊	
	通讯总台	曹国斌	
	野战医院	马志超	
	淞沪区指挥部	淞沪一团	
		淞沪二团	
		淞沪三团	
		淞沪四团	
		淞沪五团	
		直一营	
		直二营	
		直三营	
	温台区指挥部	直四营	
		特务大队	
		教导第九营	
		教导第十营	
		教导第十一营	
		特务营	
		独立第一支队	
	鄞杭区指挥部	水上大队	
		第三纵队	第一支队
			第二支队
			第三支队
		新一团	

1945 年 12 月

忠义救国军部队调整一览表¹

区别	番号	主官姓名	原来驻地	备考
温台区	温台指挥部	郭履洲	天台	该区指挥部现已改编为京沪路护路司令部归第三方面军指挥，驻京沪路沿线
	教导九、十、十一、十二			
	直属第三支队	崔杰	温台一带	
淞沪区	淞沪区指挥部	阮清源	肖绍及海北浦东	该区部队于 8 月下旬即改编为二、三、四、五、六、七各团，以赵次吉、高应潮、郑义、郑重、谈坤、张葆琛等为团长，及一个特务大队，其原有番号均已一律撤销。至十月间又将二、三、四、五、六、七各团及特务大队改编为别动军第十一、十二两纵队，暂驻上海附近淞沪区及其所属四个分区与团队原来均及一律撤销，以李文俊、吉猛兮为指挥
	马丁行动总队	马柏生	淞沪一带	
	吴太昆行动总队	顾伟		
	苏嘉沪行动总队	亢祖周		
	苏常突击队	黄斌		
	先遣支队	李德孚		
	江苏保安一支	谷守信		
	独立一支队	陈晋风		
	独立二支队	黄养正		
	独立三支队	徐箴楚		
	独立四支队	伍道远		
	独立五支队	王之汕		
	独立七支队	郑怨秋		
	新编第二团	赵次吉		
	新编第六团	谈坤		
前进指挥部	前进指挥部	黄征夫	苏州	调至余杭后指挥部名义即已撤销 已调至余杭整编中
	太湖行动总队	赵安民	太湖地区	
	直属第一支队	仲炳炎	澄锡虞地区	同上
	苏嘉沪地区司令	袁庆光	吴嘉吴地区	同上
	直属第六支队	王振武	京沪线	同上
	挺进第五纵队	邵南骥	京沪线	该纵队除镇江先遣支队巫孔圣部已改编为镇江保安大队外，余部已开至余杭正点编中
	独立第六团	郑克伦		已调余杭刻正点编中
本部直属各单	直属第二支队	魏显庭	原驻肖绍一带	已调回暂归二纵五团指挥
	直属第四支队	沈正	同上	已调回暂归第一纵队指挥
	诸绍行动总队	许长水	诸绍一带	该部已为诸暨县政府所收编，其番号已撤销
	东义浦行动总队	骆旭如	原驻东阳、义乌一带	该部番号早已撤销

¹ 《忠义救国军调整部队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八 0 四—579。

戴笠与忠义救国军

位	直属第六支队	楼宏茂	原驻浙东	该部已调回暂归一纵队指挥
	杭州爆破队	应雄	原驻杭州市	名义已撤销，人员亦已回
	特种行动总队	张慧芳	原驻浦东	已编入京沪路、护路司令部，归郭履洲指挥
	澄锡虞行动总队	章晓光	澄锡虞地区	已调回在余杭点编中
	杭州湾行动总队	徐镜吾	杭州湾一带	已奉准由长官部直接点编处理
	京沪行动总队	郭中仁	澄锡虞地区	已调回刻在余杭点编中
	直属第一支队	金家让	吴嘉吴地区	原名吴嘉吴行动总队，已调回点编，现暂归三纵队指挥
	和县行动总队	曾亮文	和县附近	番号近撤销，该部任其归何部收编
	京建行动总队	张鼎	江密高湾漂风一带	已电请南京李人大通知就收点编
	宜兴行动总队	史耀民	鼎蜀山一带	已编江苏保安团
	金华地区行动总队	徐星洲	金华地区	已调回现暂归第二纵队第四团指挥
	崇德地区行动总队	朱森	崇德地区	已由淞沪区指挥部并编
	先遣行动总队	陈默	上海附近	该部九月中旬已编入余杭点编中
	江宁别动队	苏沂山	江南地区	已调回刻正在余杭点编中
	力行行动总队	金颂新	浙东夕义一带	即现在新兵第一团，已调回正在淳安点编中

1946 年

编入交通警察总队

交通警察第十一总队 总队长 李 让
 交通警察第十二总队 总队长 王春晖
 交通警察第十三总队 总队长 姜建中
 交通警察第十四总队 总队长 鲍步超
 交通警察第十八总队 总队长 郭履洲

后 记

此文名为毕业论文，也即是硕士三年的见证和结果之一。我想说的是，别人用三年时间取得的成果，我其实是用四年才取得的，其中包含了我本科毕业后考研的一年。毫无疑问，这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过人生道路中的痛苦抉择和沉寂，也享受着理想追求中的平和和快乐，其中的欢笑和泪水，荣耀和艰辛，经历过，便都是收获。

文章着重于研究戴笠与忠义救国军的关系问题，所涉及的只是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大概轮廓，对于忠救军在敌后与日伪的一些战斗和破袭成果只是略有选择地提及，与日伪及新四军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着墨不多，而更多真正的血肉可能还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仍将竭力去充实此文，同时更是充实自我。

从写这篇文章来讲，我断断续续花费了将近三年时间，从选题到开篇，从布局到结尾，我的导师马振铎先生给予了我无穷的帮助。不仅赋予了我写作此篇的勇气，也不断在海峡两岸搜罗材料，在实际写作中进行详细的指导，想来何其荣幸！终于成文之时，最想感谢地就是马老师。

张连红老师在我写作过程中也给予了很多鼓励和帮助，在此致谢！同时也感谢给我诸多教益的经盛鸿老师、吴晓晴老师、陈虹老师、肖永宏老师、郑忠老师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南大港台图书室和校图书馆特藏室各位老师查阅资料时对我的帮助。

也感谢仇松杏、苗李华、陈晓红等我的同学们，感谢他们在学业和生活上对我的帮助。

以前的止于此，一切将重新开始，当我跨出四年这个门槛的时候，眼前道路错综复杂，然而来处光明依旧，我即微笑前行。